

无产阶级专政

卡尔·考茨基著

目 次

一	問題.....	1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2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7
四	民主的效果.....	14
五	专政.....	23
六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33
七	苏维埃共和国.....	38
八	实际事例的教育.....	48
九	专政的遗留物.....	56
	甲 农业.....	56
	乙 工业.....	66
十	新理论.....	74

一 問 題

現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統治者。这是一个远比一八七一年无产階級取得对巴黎市的統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維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階級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別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別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統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統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两个社会主义派別之間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間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階級，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錯誤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階級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們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們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們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問題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問題已經決定性地影响着我們的宣傳和策略的性质。

但是，我們党的責任在于：在我們透彻地审查过双方的論据之前，对于贊同俄国的兄弟內部爭執的一方或他方姑且不作決定。

有些同志想要阻止我們这样做。他們宣称，未經审查就表示贊同現在执政的这一派乃是我們的义务。任何其他态度仿佛都会危害

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无非是要把那种恰恰还有待于事情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事情来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其中一派已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鼓励它继续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讨论，从而就已经站在民主上了。专政则并不要求去驳倒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讨论，另一个方法禁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們党内还不居统治地位；我們这里仍行自由讨论。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的论点之后才可能符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词不足凭信。正确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因此，我们愿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作为一种政体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怎样的条件。

二 民主和夺取政权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

然而精确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纲领》）

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

無產階級作為最下層的階級，不消滅產生剝削和壓迫的一切根源就不能解放自己；又因為在一切被壓迫和被剝削的階層中，工業無產階級是這樣的一個階層：它的力量、戰鬥力和鬥爭性都在不斷增長，而它將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後勝利。因此，今天每一個真正反對剝削和壓迫的人，不管他出身於哪個階級，都必須投身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

在這個鬥爭中，我們把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當作目的，因為在現有的技術和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看來是達到我們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們證明我們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而且證明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或者說才能最理想地實現（就像蒲魯東所假定的那樣），那末我們就勢必要擯棄社會主義，但絲毫不放棄我們的最終目的，甚至恰恰是為了這個最終目的，我們才不得不擯棄社會主義。

因此，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區別不在於一個是手段而另一個是目的。它們二者都是用來實現同一目的的手段。

兩者的區別在其他方面。社會主義作為解放無產階級的手段，沒有民主是不可設想的。當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礎的其他基礎上，也必須進行社會生產。在不發達的條件下，共產主義經濟恰恰會成為專制主義的基礎。恩格斯早在一八七五年談到俄羅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種村社共產主義時就認定了這一點。（《論俄國的社会关系》，一八七五年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

荷蘭殖民主義政策曾在一段時期內，在爪哇用所謂“墾植制度”的名義，在土地共產主義的基礎上替剝削人民的政府組織農業生產。

但是不民主地組織社會勞動的最顯著的例子還是十八世紀巴拉圭的耶穌教團國家。耶穌教團教士們作為統治階級，在那里利用專政的權力，以一種確實值得欽佩的方式組織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勞動，他們沒有使用暴力而贏得了被他們統治的人的擁護。

但是對於現代的人來說，這樣一種教權統治就是無法忍受的了。這種統治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統治者的知識水平

比被統治者高得多，而被統治者完全沒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等的水平上。一个从事解放斗争的阶级或阶层不能把这样一种监禁制度当成目标，而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制度。

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把这个命题干脆就颠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纯粹民主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情况下都是设想的，譬如，在小农的共同体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有着对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好比手段同目的关系的人，显然就是指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但同时他们往往要补充说，民主其实并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结论必须彻底地加以驳斥。这个结论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运动向极不幸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

这里涉及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有人宣称，如果在一个直接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那末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的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末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

階級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階級要千方百計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們这样劝說无产階級，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裝飾，那末无产階級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無論何地的无产階級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們会馴从地放棄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說可以預料，他們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試圖用暴力来摧毀人民权利时，他們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顛复。无产階級对民主的評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末人們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不應該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無論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末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連軍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內——就愈依賴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階級在数量上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階級沒有組織起来并且沒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軟弱，那末，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鎮压无产階級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階級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現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話，那末“資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調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廢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階級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一八七二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①代表大会閉幕后，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談到其他問題之外，他曾闡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定会取得政权，以便建立新的劳动組織。工人必須打倒那些維持着旧制度的旧政策，如果他不像那些忽視和鄙視这类事情的旧基督徒那样放棄‘尘世的王国’的話。

“但是我們並沒有断言，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無論在何处都是一样的。

^① 指第一国际。——譯者注

“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制度和風俗和習慣。我們並不否認，有這樣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如果對你們有更好了解的話，也許我還會加上荷蘭，在這些國家里工人通過和平的道路達到他們的目的。然而並不是在所有的國家情況都如此。”^①

馬克思的預測是否會實現，尚須等等再看。

在上述國家里，有產階級中確實有某些階層，它們想用暴力付無產階級的傾向正在增長。但是另外也還有其他的階層，無產階級日益增強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們想要通過讓步來討價還價的願望也正在增長。儘管戰爭狀態在其持續期間無論在何處大大地束縛着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的行動自由，然而戰爭狀態也大大地擴大了英國無產階級的選舉權。目前還根本無法看出，在這些國家里，民主將如何影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形式，以及民主在雙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採用和平方法方面將起多大的作用。無論如何，民主的存在在這方面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里，人民的權利幾十年來、甚至幾百年來已經在那里牢固地扎根。這些權利是人民通過革命而贏得並且保持或擴大的，同時人類的教育統治階級要尊重人民群眾；在一個這樣的共和國里，過渡的階段將不同於那樣的國家：其中軍事專制統治迄今一直毫無限制地擁有鎮壓人民群眾的最強大的權力手段，而且習慣於用這種手段鎮壓人民群眾。

然而在社會主義以前的時期內，民主對我們的意義並不僅在於民主對於過渡到無產階級統治去的形式所發揮的影響。對我來說，民主在這個時期內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民主對無產階級的鬥爭所發揮的影響。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頁譯者注

三 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

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存在的小企业都在日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趣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而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抵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非在没有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产生的；资本家对小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意志。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达到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

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努力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願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还在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得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

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襲击来取得国家政权，从而給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組織和管理自己，仿佛該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組織和管理他們，正如耶穌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組織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預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領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新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領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为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見《和諧和自由的保证》——一八四九年第三版，第312頁）

好一个偉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預見。然而，这种預見仅仅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領袖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們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們深信无产阶级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組織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是一个空想的話，那末，由于资本主义已經使工人阶级貧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嗎？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論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一些組織和宣傳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貴族进行爭取選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們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貧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缩短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間开始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貧困化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們同其他

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颂扬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轻蔑地谈论民主。

“共产主义者在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上意见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說政治家们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统治，对于从旧组织到完美的新组织之间的过渡时期来说是不适宜的。尽管如此，卡贝^①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统治的原则，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内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领袖欧文，则终于认为每人都应该按其年纪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

^① 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統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保证》一书，第147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統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末所有的人都必须进行統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統治，而是人民中的一些人的偶然的統治。”（见第148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偉大的天才来統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評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詳細地援引魏特的話，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紹給我們的对民主的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輕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人却在爭取这些权利，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連爭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为了贏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組織、宣傳和爭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长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高的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吗？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嗎？这个问题今天是頗有爭論。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答案則是坚决否定。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輕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是一种在我們还不能实例来进行实际論证之前就可以靠統計学来确定和計算的情况。无论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討論这种问题时过分地強調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錯誤的。毫无疑问，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有资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那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為什麼必須如此。但這樣說却是正確的：即大企業愈是發達，也就是說，需要社會化地加以組織的企業的數目愈少，社會主義就愈加易于實現。然而這一點只有在從一個特定國家的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時才能加以適用。可是在這個範圍內把問題簡單化，是會被下列事實所駁倒的：即隨着大企業的成长，同時也會引起市場的擴大、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流的發展、從而也就引起對生產加以社會化組織的問題的不斷擴大化和複雜化。而且，我們沒有理由來斷定：在現代工業國家里，由於有其銀行制度和企業主組織，現在已經有可能由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和合作團體來把絕大部分的生產為了社會的目的而組織起來。

決定性的因素已經不再是物質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無產階級是否足夠強大和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足以由自己來掌握對社會的管理？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是否具備那種能使政治民主擴展到經濟領域、實現經濟民主的力量和能力？這還不能作肯定的預言；這裡所涉及的因素是一種在每個國家里發展得懸殊很大的因素，這個因素在同一國家里在不同的時期也有很大的變化。因為，足夠的力量和能力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同等程度的力量今天在敵人強大的情況下可能是不夠的，而到明天，當敵人陷於道義上、經濟上或軍事上的崩潰時期又可能是完全足夠的了。

同樣，同等程度的能力今天在十分複雜的形勢下取得政權時可能是不能勝任的，而到明天，當出現了更明朗、更簡單、物質基礎更好的條件時，則又可能對各種需要都應付裕如了。在各種情況下，只有實踐才能說明無產階級是否已經成熟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我們只能肯定以下的說法：即無產階級在人數、力量和智慧方面正在不斷增長着，它正在愈來愈接近它的成熟時期。也許不能從一開始就衡量出什麼時候才能達到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已經占人民的多數而且人民中的多數已經表示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意志時，我們不能就肯定地說，它已經達到成熟時期。相反的，我們卻可以肯定地斷定，只要人民群眾的多數還對社會主義抱敵對態度並且不想要社會主義，這

个国家的人民就还没有成熟到能实现社会主义。

所以这里又一次说明，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

四 民主的效果

现代国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有机体，是一种握有现代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并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的机构，这种现象在战争情况下最为明显。在这种国家里，人人都能感到，国家政权的政策何等强烈地决定着他的生存。

今天国家对个人的关系，无异于从前氏族公社以及后来的封建国家对个人的关系。但是，如果说这种公社的机构是以民主方式组织来的话，那末，相反的，现代国家权力——官僚机构和军队——是居于人民之上，甚至它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它往往在政治上至强大得胜过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且构成专制的政府。

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会持久的。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会导致官僚的僵化，导向一种陷于无止境的连篇累牍和浪费时间形式主义的状态。而这恰恰又处在正当工业资本主义正在成长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使种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使工商业务迅速发展并且要求极度迅速的当机立断。

同时，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还导向办事专断和行贿舞弊；而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生产者都依赖许多其他生产者——这样的社会生产制度，则为了能繁荣起来就需要社会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因此，专制国家就处于一种同生产条件的矛盾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并且成为一种妨碍生产条件的桎梏。于是就迫切需要把国

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評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組織来制約国家机构，实行乡鎮自治和分省自治，剝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并且把官僚机构置于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中央議会的、也即国会的監督之下。

議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監督政府，在这一方面，議会是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来替代的。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剝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即由专家委员会来拟定法律，然后提交人民公决；那末，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設想的，尽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行。但是，即使最坚决主張直接由人民进行立法的人士，也并不贊成由人民来直接監督政府。領導着国家机关的中央机构的活动，只能由另一个中央組織来監督，而不能由像人民那样的无組織的散漫的群众来監督。

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絕對权力的意图，是现代国家的所有各階級所共同怀有的，只有那些参与政权的人例外。因而可以說是全体；只有官僚、軍官、宮廷貴族、国家教会以及那些同国家之間进行着有利的金錢生意的大銀行家們除外。在其他階級——其中包括乡紳、低級教士、工业資本家——的联合压力下，专制政权不得不屈服。这个政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答应給以新聞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和一个議会。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这种发展过程都胜利地得以实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階級都想使这个新的国家具备一种最能适应其特殊利益的形式。这种企图在确定議会組織形式的斗争中，也即在爭取选举权的斗争中，表现得特別明显。

下层諸階級的、也即“人民”的口号，就是普遍选举权。取得这种选举权，不仅符合工資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符合小农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無論在何处，無論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階級合起来总会构成居民的大多数。无产階級在这个大多数里是否占优势，这要看經濟发展的水平而定。但是，劳动階級总人数在居民中是否占大多数，却并不取决于經濟发展的水平。剝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从长远来看，任何現代国家都不能抵擋这种群众压力，而且，在今日的社会里，除了普选制以外的任何其他种选举制都会成为荒唐

可笑的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其情况经常变化，阶级不可能固结为固定的等级。各种社会条件都在不断变化。这一点就已经使等级选举制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但是，一个不作为等级而组成的阶级则构成了一种不定形的、随时流动着的群体；要确切地划分这个群体的界限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阶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范畴，不是法律中的一个范畴；阶级成员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许多小手工业者和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觉得自己是有产者，而在大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则又觉得自己是无产者，而且还变成真正的无产者，尽管统计学还把他們算作是有产的独立企业主。现在也没有那种能保证有产者在议会中获得持久的垄断地位的、根据纳税额多寡为标准的选举制。每逢货币贬值，这种选举制就遭到破坏。由于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那种根据教育程度高低为准的选举制也终于愈来愈有意义了。

因此，各种因素一起发挥着作用，使那种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今日的社会里成为唯一合理的选举权，并且使这种选举权愈来愈得势。

首先，从作为居民中最低层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权是唯一合理的选举权；无阶级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它的人数。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在劳动阶级中占大多数的时，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

但是，无阶级的利益还在于：选举权不仅应该是普遍的和平等的，而且还应该是无区别的，即男子和女子，或者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等不应区分什么类别来进行投票。这种区分不仅带来一种使那些按其整个社会处境来说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但是在形式上还不算作无产阶级的诸阶层从无产阶级中分离出去的危险，而且还带来一种使无产阶级观念狭隘化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无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即社会整体的利益与无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虽然无阶级的长远的阶级利益同它的暂时的

特殊利益并不永远含义相同。

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重大的社会关系和目标而把自己的阶级觉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就是无产阶级成熟的一个标志；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会把这一认识提高到完全明确的程度，这一认识不仅将由它的理论，而且还将由它的实践来加以提高和普及，如果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时是着眼于整体的而不是单单着眼于它的特殊利益的话。任何把眼光局限于行业利益的做法，都会使观念狭隘；这构成了单纯工会主义的一个阴暗面，而这里就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优越性所在。这也是无区别的选举法在与那种把选民区分成不同类型的选举法相比之下的优越性。

在争取上述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产生了现代民主，无产阶级也在这种斗争中成熟起来。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因素：即对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

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力图永久保持其统治。用暴力来镇压一切反对派，是它的生存原则。几乎在一切地方，要推翻这种统治都只有通过一种用暴力来粉碎其暴力的方式。

民主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正如以上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多数派是在变化着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政权都不能长久执政。

诸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就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象，至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但是，政党力量的变化比阶级力量的变化还要快。而在民主国家中，力求取得统治权的，正是政党。

但是在这里，人们不应忘记，而人们却常常忘记；为了明确地阐明现实起见，理论在抽象表达上的简单化也许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这种简单化仅仅在“直到最后”才适用于现实，在它与现实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环节。

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但是不能进行治理，因为一个阶级是一种不定形的群体，而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进行治理。在民主国家中进

行治理的正是政党。然而，一个政党同一个阶级并非含义相同，每个政党都首先是代表阶级利益的。同一个阶级的利益，可以以各式各样的方式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方法来代表。同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其策略方法的差别性，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政党。在这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方针问题。很难得会有一个阶级拥有能够单独统治一个国家的那样强大的力量。如果一个阶级得了政权而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持这个政权，那末它因而寻求同盟者。如果它有可能获得不同的同盟者，那末在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中间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党派倾向性。

英国十八世纪的辉格党和托雷党^①就是这样代表着同样的阶级利益的。但是前者力求在牺牲王室及其权力手段的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借此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后者则认为君主制度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今天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保守党和自由党都代表着同样的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其中一个党认为，通过镇压工人来同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才最能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另一个党则害怕这种政策会引起有害的后果，而力图用微小的让步——首先是在牺牲地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来安撫工人阶级。

正在兴起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是同那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相仿佛的。

因此，政党和阶级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阶级可以分裂成不同的政党，一个政党也可以由不同阶级的分子组成。一个阶级可以继续实行统治，然而执政的政党可以更换，如果统治阶级的大多数认为迄今执政着的政党的方法有缺点而其竞争对手的方法更为有利的話。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内，政党政府的更换比阶级统治的更快得多。

^① 辉格党是自由党的前身，托雷党是保守党的前身。——译者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党都不能很有把握地一直执政下去，任何政党都必须估计到变成少数派的可能性，但是国家的性质——如果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的话——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属于少数派。

在民主国家里，从这些条件中就产生了对少数派的保护，民主愈是根深蒂固，民主的传统愈悠久，它对政治习惯的影响愈长久，那末少数派就愈能发挥作用，愈能有效地对那种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保持其政权的任何政党的意图进行对抗。

对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微小的少数派开始的——来说，保护少数派具有何等的意义，这种保护对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有何等重大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是很重要的。任何新的学说，无论是理论性质的学说或策略性质的学说，在开始兴起时都只由少数派来主张的。如果用高压手段把它压制下去而不去同少数派进行讨论，那末多数派就可以免去很多的辛苦和麻烦。在某些情况下，多数派因而就能省去某些不必要的工作，因为并不是每一种学说都由于它是新的并且是被少数派所主张而就都意味着是一种进步。在那些作为新思想而出现的学说中，大多数是在以前早就被人提出过而且已经通过讨论或实践而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只是由于不学无术，才有人把旧货色不断重新提出来。另外还有些思想是独创的，但同时却又是完全荒诞的。然而，即使新思想和意见中只有很少是真正进步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毕竟都只有靠新的思想才可能实现，而这种新思想起先只是作为少数派的意见而出现的。因此，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世界正在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还不为人所知的、用传统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即使从被人提出的新事物中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它毕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不要使我们的运动僵化而且要使它日益成长以适应任务的高度要求的话。适用于政党的道

理，同样适用于国家。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

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即民主所赋予政治斗争的形式。我在一八九三年就已经在《新时代》的一篇论《社会主义问答教材》的文章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后来在一九〇九年在我所著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又再次作过论述。我从其中摘引一段如下：

“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普选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普遍兵役制），这些制度不仅是一种可供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那些在当年努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诸阶级对比之下能有利地加以运用的武器；这些制度而且还能使各个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显示出来，并且使鼓舞着这些政党和阶级的那种精神显示出来，而在专制制度时代，这些因素是无法显示出来的。当时，统治阶级也同革命阶级一样地在黑暗中瞎摸。因为反对派的意见不可能表达出来，所以政府和革命者都无从了解它们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同样都有这样的危险：即在还没有同对方较量之前一直过高估计自己，而在遭受失败之后立即又过低估计自己，于是就灰心丧气。这也许是说明为什么在革命资产阶级时代里有如此多的政变暴动迅速镇压下去而归于失败，又有如此多的政府突然被推翻、从而产生革命和反革命相互交替局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则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那些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种民主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门。如果有人因而就想说，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有危险的，这个阶级由于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和痛苦而感到满足，这个阶级已经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末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必然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但民主能做到一件事：这就是它虽不能防止革命，但能防止某些

尚未成熟的、沒有希望的革命嘗試并且能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不必要。民主能明白地显示各个不同的政党和階級之間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不会消除它們之間的矛盾，也不会打乱它們的最終目的，但是民主能使新兴的階級不去試圖完成它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民主还能使統治階級不去拒絕那些他們已不再有力量来拒絕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不因而有所改变，但发展的历程会更加肯定，更加平稳。在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中不会显出像資产階級在其革命时代所显出的那样明显的胜利，但是也不会显出那样重大的失败。自从六十年代里現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遭到一次大失败，这就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仍然受着帝国統治的后果的影响——帝国是不让人民享有真正民主制度的，法国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达到階級自觉，起义是被强加給法国无产階級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也許显得比資产階級革命时代的斗争方法单调些，毫無疑問，这种方法是較欠戏剧性，較不有声有色，但是这种方法所要求的牺牲也小得多。对于富于文艺灵感的文人們來說，这种牺牲也許是很无关紧要的，这些人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是为了寻找有趣的玩意儿和有趣的材料，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进行斗争的人們說来，这种牺牲就决不是很无关紧要的。

“这种限于运用非軍事手段，議會活动、罢工、游行示威、新聞出版事业之类的压力手段的所謂和平的階級斗争方法，在任何国家里，只要它的民主制度愈有效，居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識別能力愈强，自治能力愈强，就愈有繼續保持下去的前途。”

由于这些理由，我預料无产階級的社会革命将采取与資产階級所采取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我还預料：与資产階級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經生根的一切地方，都将以“和平的”經濟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第 53 頁）

我今天的見解还是如此。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仅仅只有光明的一面，人們在民主里也可以发现阴暗的一面。

凡是在无产阶级处于无权状态的地方，无产阶级也許不能发展任何群众組織，在正常时期內也不能进行群众斗争，在那里，只可能由少数杰出的无限勇敢的战士处于同統治的政权經常对抗的地位。他們天天都被提醒有必要、甚至确实亲身感到有必要去彻底推翻整个制度。他們不被日常政治中的小小的要求扰乱思想，而把精力完全集中于最重大的問題上，并且学会随时能考虑通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在那里，无产阶级中只有很小的一个阶层在进行斗争，但是他滿怀着最高度的理論兴趣，滿怀着被崇高的目标所鼓舞起来的热情。

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之下，无产阶级每天甚至只有几小时归自己支配的时间。民主发展出那种包含着大規模管理工作的群众組織；民主还喚起公民討論和解决許多日常問題，这些往往是极其瑣屑的問題。无产阶级的整个空闲时间愈来愈被“小事”所占去，他們愈来愈为細小的眼前成果而奔忙。而他們的思想則縮小在狹隘的圈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不懂理論、最后甚至忽視理論、机会主义，这一切就会日益替代大的原則而占上風。因此，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德国工人同西欧和美国工人对比时称贊德国工人的理論兴趣的話，那末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就会在把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对比时发现俄国工人理論兴趣上的这种优越性。

虽然如此，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依然还在各地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斗争，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还为此而流血牺牲。

他們很知道，沒有民主是不行的。反专制的斗争的有益效果，然只限于达及少数杰出人物，不能遍及整个群众。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应夸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庸俗化效果。其实这种庸俗化是无产阶级目前缺乏空闲时间的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后果。

果享有自由反而一定会比沒有自由使人变得更加繁瑣和狹隘，那就真是奇怪了。民主愈能使劳动時間縮短，工人所能支配的空閑時間也就愈长，他們也就能有更多的時間除了从事于必要的小事之外还去从事于較大的較广泛的問題。

同时，促使他們这样做的动力并不是沒有的。因为，無論民主能發揮多大的效用，只要民主还没有战胜資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末单靠民主就总不能消除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矛盾。相反的，資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正在增长，这种矛盾不断引起重大冲突并且不断使无产階級面临重大問題，这种問題提高了无产階級的認識能力，使之越出日常瑣事的界限。而在民主国家里，这种提高就不再限于单单提高少数杰出人物，而会变成人民群众本身的提高，人民群众同时就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被鍛炼得具有自治的能力。

在民主国家里，无产階級并不像在专制統治之下那样，光是不断思考着和談論着革命。无产階級可以单单談論小事达几年甚至达几十年之久，然而終究必然会在各地都不断出現那种会燃起无产階級革命思想和革命努力的形勢。

如果这种形勢的出现在一个民主国家引起了实际行动，那末下列的可能性就会比在一个专制国家里要大得多：即这种实际行动不致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过早地发生，不致采取徒劳无功的突击，而且一旦获得胜利，胜利也不致再丧失，而能成功地保持下去。这終究比一次新的革命戏剧的那种单纯振奋神經的一时轰动还重要得多。

五 专 政

民主构成了建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缺的基础。只有在民主的影响下，无产階級才能达到它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成熟程度。民主毕竟将提供用以測量无产階級成熟程度的最可靠的标尺。

在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而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准备社会主义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需要民主——之间，总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即过渡阶段。据说，在这个中间阶段里，民主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这种看法并不是新的。我们早已知道这是魏特林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却以马克思的话为依据。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写的批判哥达纲领的信件（翻印于《新时代》第九卷第一期，第502页）里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还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从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但是，当然按字义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是暂时的应急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地，也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上面所指的不是政体。

民主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和平过渡。但是，没有民主，就肯定不能和平过渡。

然而为了了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如何，我们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31页。

不需要去猜謎語。如果說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沒有進一步闡明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什麼而言，那末他這樣做也許是因為他在幾年之前在他論述《法蘭西內戰》的著作中已經對此加以闡明。他在那本書里說：

“公社在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對占有者階級進行鬥爭的結果，是一種終於被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

由此可見，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這本書第三版的導言中所明確指出的那樣，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這個專政並不同時就是廢除民主，而是以普選制為基礎的最廣泛地應用民主。這個政府的權力應該服從普選制。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出的城市代表所組成的。……普選制應該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舉權為任何別的僱主服務那樣，為他們去找到工人等等。”（第46、47頁）^②

馬克思在這本書里一再談到全體人民的普遍選舉權，而不談一個特殊的特權階級的選舉權。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在無產階級占壓倒多數的情況下從純粹民主中必然產生出來的狀態。

因此，那些贊成專政反對民主的人是不能依據馬克思的話的。當然，這並不因此就足以證明他們是錯誤的。不過他們必須尋求其他的證明理由。

在探討這個問題時，必須防止把這種作為狀態的專政同那種作為政體的專政兩者混淆起來。只有後者的傾向才是我們隊伍中的爭論的問題。作為政體的專政，同剝奪反對派權利的含義相同。反對派被剝奪了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問題在於，勝利的無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501頁。——譯者注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98、500頁。——譯者注

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顺利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当我们把专政作为政体来谈论时，我们就不能谈论一个阶级的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个阶级只能实行统治，不能实行治理。如果有人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末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本身分成不同的政党，那问题就立即复杂化起来。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如果社会主义诸政党由于它们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态度不同而分裂，如果比方说一个政党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取得政权的话，那末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变成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应该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称的形式呢？谁要是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就不能忘记，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状态，而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出现的状态。

人们也许倒可以推断，通常只有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大多数或者至少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会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在其政治斗争中的武器，除了它的经济必要性之外，就是它的群众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群众的，也即大多数居民的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能战胜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这样的推断。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

“迄今所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而且都是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①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20页。——译者

这一点也适用于巴黎公社。新的革命政权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有普遍选举权的公民投票。这次在最充分自由之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是：几乎巴黎各区都以强大的多数支持公社。六十五名革命者当选，而反对派只有二十一名当选，其中有十五名露骨的反动分子，六名甘必大派激进共和主义者。六十五名革命者中间有法国各个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虽然他们互相斗争得很剧烈，但是他们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实行专政。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支持的政权使用暴力，不是为了放弃民主，而是为了保卫民主。如果这个政权想要消除它的最可靠的基础，要消除伟大道义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它就简直是自杀了。

由此可见，作为废除民主的专政，只有在下列的非常情况下才能加以考虑：即如果各种有利条件的特殊巧合允许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尽管大多数居民不赞成或者坚决反对这个政党。

在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政治上的训练并且其政党具有固定存在形式的民族里，这种偶然的胜利是不大可能的。这种胜利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很落后的情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普选时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结果，那末这个政府究竟应该按照我们一向所要求于任何政府的那样，服从人民的裁决，同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为争取政权而斗争呢，还是应该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地位而扼杀民主呢？

一个专政在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情况下靠什么来继续执政呢？

这个专政有两条道路可以考虑：耶稣教团的道路或拿破侖主义的道路。

我们已经提到了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赖以

維持他們在巴拉圭的專政的手段，就是他們比起那些由他們組織來的、缺了他們就無依無靠的原始居民來具有精神文明上的巨大越性。

在一個歐洲國家里，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能爭取到這種優越性，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在其階級鬥爭中誠然在理解水平上展得超過其他勞動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小農，但是其他勞動階級在政治興趣和理解方面並不是沒有提高。這些不同階級之間的距離，決不會是無法克服的。

但是，除了體力勞動的階級之外，還有一個知識分子階層正在生長，他們的人數愈來愈多，對於生產過程來說他們愈來愈成為不可缺少的了，他們的職業在於獲得知識，運用智力和發展智力。

這個階層處於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中間地位，他們不直接對資本主義感興趣，然而卻又對無產階級抱不信任態度，他們還認為無產階級沒有成熟到足以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甚至在這個受過教育的階級中那些極熱烈主張無產階級解放的成員，如像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在階級鬥爭的初期還對工人運動抱過這種態度。只有當無產階級在其階級鬥爭中表現得愈來愈成熟時，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那些贊成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所抱的信任，是決不能同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以來自由黨人和中產階級人——甚至德國諸政府本身——對參加政府的社会黨人所寄與的信任相混淆的。前一種信任是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無產階級已經得了解放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後一種信任却出於這樣一種信念：即有關的社會黨人已經不再認真對待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了。

完全排除知識分子甚至反對知識分子，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生產。在大多數居民對無產階級政黨抱不信任態度或者反對態度的情況下，知識分子群眾尤其會抱這種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勝利無產階級政黨在知識方面不僅不會大大優越於其餘的居民，甚至在這方面落後於它的對手，即使在社会事務方面，無產階級政黨的觀點一般說來應該是更高明一些的。

由此可見，巴拉圭的道路在歐洲是行不通的。於是，只剩下另一條道路了，這條道路是拿破侖一世在一七九九年霧月十八日以及他的侄子拿破侖三世在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所採取的，這就是借助于足以勝過無組織的人民群众的一種中央集權組織的優勢並且借助于軍事威力的優勢來進行統治的道路；這種軍事威力的優勢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政府的武裝力量所面對着的僅僅是一批沒有武裝或者對武裝鬥爭感到厭倦的人民群众。

能在這種基礎上來建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嗎？這種生產方式意味着由社會來組織生產。它要求全體人民群众實行經濟自治。國家通過一種官僚制度或者通過人民中某一個階層的專政來組織生產，這並不意味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需要對廣大人民群众進行組織上的訓練，社會主義要以無數個經濟性的和政治性的自由組織為其前提，並且需要最充分的組織自由。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不應該是一種兵營組織。

少數派的專政，如果想要給人民以最充分的組織自由，就會因而損壞自己的權力。如果相反地，這個專政企圖用束縛這種自由來保持統治，那末它就會阻礙朝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而不是促進這種發展。

少數派的專政總認為一支忠誠的軍隊是它的最有力的支柱。但是它愈是用武力來代替多數，它就愈來愈迫使反對派用訴諸刺刀和拳頭的辦法而不是用選票的辦法來尋找出路，因為選票對他們說來已不起作用了；這樣，內戰就成為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的轉化形式。在人們對政治和社會情況不是完全冷漠或完全灰心的地方，少數派的專政就會經常受到猛烈的暴動或者長年游擊戰爭的威脅，這種暴動和游擊戰爭很容易發展成為有更廣大群眾參加的連續不斷的武裝起義；要撲滅這種起義，就必須調動專政的全部軍事力量。這樣，專政就陷入內戰而不再能自拔，並且經常面臨着一種被這種內戰推翻的危險。

但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說來，再沒有比內戰更大的阻礙了。

在目前这种有广泛的地理分工的时期，任何地方的大工业企业都分依赖交通的安全和契约的安全。一次对外战争就足以极严重地扰乱社会主义建设，即使敌人并没有侵入国境。在目前俄国革命中，国内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和平对于社会重建的必要性，这是正确的。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内战的危害性比对外战争的危害性还大得多。内战是在国家境内进行的，它对国家所起的摧毁作用和瘫痪作用同外国侵入同样严重，内战在这方面甚至还残酷得多。

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所牵涉到的通常是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的取得权力或丧失权力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整个生存问题。是在战后，不同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都愿意和应该和平相处，而不会总是友好相处。

内战中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它们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从对方夺取一些让步然后同对方和平相处。内战中的情况也不像在民主国家里的情况那样；在民主国家里，诸少数派受保护，因此，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不得不放弃执政地位的任何政党不是因此就必须放弃它的政治活动或者哪怕只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任何政党都一直保留着那种争取成为多数派并从而取得政权的权利。

在内战中，任何一方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失败的一方面临全毁灭的威胁。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就使内战很容易成为非常残酷。一个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才取得政权的少数派尤其倾向于以最血淋淋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并且用最凶残的屠杀来惩罚反对者，如果这个少数派在叛乱中受到了威胁并且终于能够把叛乱镇压下去的话。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流血周就以惊人的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长期内战的局面，还是这种局面在专政之下的另一表现形式——群众陷于完全冷漠和灰心丧气的状态，都会使社会生产体制的建设实际上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那种必然会引起这种和冷漠状态的少数派专政竟然成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完美手段!

有些人把内战同社会革命混淆起来，认为内战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并且倾向于用下列理由来替那种在内战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解：即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有革命。据说在任何革命中过去总是如此，而且今后将永远如此。

而恰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抱这种看法：即凡是过去一直是如此的情况今后也就必然永远如此。我们根据迄今所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形成了我们所想像的革命图景。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专制制度压迫着一切自由运动的国家里爆发的，专制制度依靠一支脱离人民的军队的支持；在这种国家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没有普选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议机构。在这种国家里，反政府的斗争必然采取内战的形式。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将在下列这样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几十年以来，民主——即使不是“纯粹的”民主，但毕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已经扎下深根，而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完全脱离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构成人民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将如何实现其夺取政权，这还需要等等再看。我们无论如何也决不需要推断，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会在西欧重演。如果今天的俄国显得同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很相似的话，那末这仅仅证明俄国是何等地接近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必须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内战区别开。

社会革命是一种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以持续达几十年之久，而且无法划定这个过程结束的确切界限。实现这个过程的形式愈和平，它也就实现得愈成功。内战和对外战争都是这个过程的对敌。社会革命的序幕通常是政治革命，也即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突然变化；一个迄今一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阶级借此而夺得了政府机器。政治革命是一种能迅速实现和迅速结束的突然行动。它的形

式要看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个国家的形式而定。民主——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在劳动群众的力量中扎了根的——愈是居統治地位，政治革命成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就愈大。相反的，如果迄今居統治地位的制度愈是不依靠人民的大多数，而只代表仅仅依仗軍事手段才保持其統治地位的少数派，那末政治革命采取內战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拥护社会革命的人也有迫切的关系要使內战仅仅成为暫时的、迅速进行的一段插曲，要使內战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巩固民主，要使社会革命受民主影响的支配，就是说，在当时，社会革命不能超越人民群众大多数所願意达到的程度，因为社会革命如果超越这个程度，就不能获得那种賴以形成新局面的必要条件，无论那些有远見的英明人士认为立即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何等称心如意。

然而，巴黎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恐怖統治——也即少数派的专政，难道在法国大革命中沒有产生那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作用嗎？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些作用是什么性质的呢？那种专政是結盟君主們对革命的法兰西所进行的战争的产儿。胜利地击退种种进攻，就是恐怖統治的历史功績。这个专政从而就又一次明显地证明了这一条老真理：即专政比民主更能进行战争。但是它决不能证明：专政是无产階級根据无产階級观点来实现社会改造和保护无产階級的方法。

在威力方面，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統治是无比强大的。虽然如此，巴黎无产階級依然未能因此而保持住政权。专政变成了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政策的各个派別之間互相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而专政終于还变成了結束无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一切政策的方法。

下层階級的专政替軍人指揮刀的专政鋪平了道路。

如果有人根据資产階級革命的实例而想說，革命是同內战具有相同的含义的，那末他就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結論說，革命必然

倫威爾或拿破侖式的統治而告終。

然而，這在那些由無產階級構成民族大多數並且用民主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里，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結局。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具備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

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理解為別的，只能理解為在民主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統治。

六 立憲會議和蘇維埃

民主和專政之間的矛盾，目前在俄國革命中獲得了十分現實的意義。

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是在分裂狀態下參加革命的。他們分裂為社會革命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主要代表農民；與歐洲其他各國不同，俄國的農民還是一個革命因素，因而能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攜手並進。同社會革命黨人對立的另一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即工業無產階級的代表。馬克思主義者又分成兩個派別：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認為，在俄國現有的經濟基礎上，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除非在俄國革命的同時，歐洲也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一直只相信意志和暴力是萬能的，現在不考慮俄國的落後性，想要使革命立即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在革命過程中，這些矛盾加深了。孟什維克認為，在立憲國民議會組成正式政府之前，他們的任務是參加臨時聯合政府。布爾什維克則想要在立憲會議還沒有召集以前就推翻這個臨時政府，並且用一個由他們的黨所組成的政府去替代它。此外，在媾和問題上也有深刻的矛盾。孟什維克想要立即媾和的迫切心情不亞於布爾什維克，兩派都主張在齊美爾瓦爾德會議決議的基礎上實行媾和——即不割地和不賠款。兩派都參加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而且孟什維克

在那次會議上屬於多數派。但是孟什維克想要普遍媾和，他們各交戰國都接受不割地不賠款的口號。只要這個目的還沒有實現，俄國軍隊就應該一直保持作戰準備狀態。布爾什維克卻要求不付任何代價立即媾和，必要時準備用單獨議和方式來媾和，他們為了強迫實現這一點，還加緊瓦解本已在瓦解的軍隊。

他們還獲得下述這兩個因素的支持：即軍隊中和人民中間群眾的普遍厭戰情緒以及臨時政府似乎無所作為的樣子；臨時政府在政治和社會改革方面所做的事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在國內所做到的也許已經多得多了，但是還沒有做到人們對一個政府所期望的那么多。立憲會議的選舉，不能像人們所希望的迅速實現。首先必須對舊的官吏機構實行革新；民主的市議會和縣議會必須建立。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內，選民名冊的編造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俄國最近一次的戶口調查還是在一八九七年進行的，因此，立憲會議的選舉連續一再延期。

但是，主要問題是媾和遙遙無期。無論這該歸咎於什麼原因，協約國的政治家們反正總不理解，宣布願意締結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對於他們自己來說何等必要。他們奉行着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使協約國以及那個與協約國協調一致的臨時政府在俄國人民心目中都顯得是媾和的障礙。這就是為什麼一部分孟什維克——社會主義者——要求脫離協約國並且起來反對臨時政府的一個理由。但是他們的行動從來沒有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激進。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就在犧牲孟什維克和臨時政府利益的同時，愈來愈得人心，並且終於能夠在去年十一月里推翻了臨時政府。他們的宣傳力量如此強大，以致於他們能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爭取到他們那兒去。社會革命黨左派從此就同布爾什維克聯合起來，他們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政府；社會革命黨右派和中派則仍然站在孟什維克的一邊。

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是從他們所鼓動起來的巨大期望中產生的。如果他們要保持他們的力量，他們就必須滿足這些期望。這可

布尔什維克的革命是建筑在这种假定之上的，即这个革命构成了欧洲普遍革命的起点，俄国的大胆創举将号召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在这种假定之下，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損害和承受多重的負担，以及媾和将对民族自决提出怎样的解釋，当然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于是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保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但是，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的手段。

只要人们承认关于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假定，以上所说的也就随之而变得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个假定还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棄和出賣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簡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誰应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态度负责呢？

这是馬克思主义的一条老原則，即革命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条件中产生的。但是西欧的条件是同俄国的条件如此地不同，以致俄国的革命并不必然定会引起西欧的革命。

当一八四八年法国发生革命时，革命立刻蔓延到法国以东的欧洲地区。然而它蔓延到俄国边界上就停下了。反过来，当一九〇五年俄国发生革命时，这在俄国以西的地区内引起了一些較强烈的选举权运动，但是没有引起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任何运动。

然而人们毕竟不該因为布尔什維克預期欧洲会发生革命而过分責怪他們。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这样預期过，而我們确实正在逼近一种可能引起阶级斗争大大加剧和产生許多惊人事件的形势。如果說布尔什維克在預期这种革命方面估計錯誤，难道像倍倍尔、恩格斯、馬克思这样的人有时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錯誤估計嗎？这是无可否

認的。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預期在一定時間內發生一次革命，從而有朝着這樣的方向確定他們的策略；就是使黨的存在，使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取決於革命的爆發，並且使無產階級面臨一種兩難的抉擇：不是革命，就是破產。

正如一切政治家那樣，他們偶而也在他們的估計上發生錯誤，但是這種錯誤從來也不能把他們引向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去，引向一條死胡同。

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把一切都押在歐洲普遍革命這張牌上。如果這張牌贏不了，他們就不得不陷入一條使他們面臨無可奈何的任務的道路。他們必須在沒有軍隊來對付強大而凶暴的敵人情況下保衛俄國。他們必須在普遍崩潰和到處貧困的情況下建立一個為人人謀幸福的政權。實現他們所努力爭取的一切目標所需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愈欠缺，他們就愈要用赤裸裸的暴力強制、賄賂來代替所欠缺的方面。人民群眾中間對他們的反對愈大，他們就愈發有必要那樣做。這樣，用專政來代替民主就成為不可避免的。

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關於他們只要取得政權就能引起歐洲革命的估計上發生了錯誤的話，那末，他們在關於他們只要奪得政權就有大多數人民興高采烈地團結在他們周圍的估計上也同樣發生錯誤。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布爾什維克作為反對派在那種俄國形勢而產生的條件之下確實已發展出巨大的宣傳力量。在初期，他們人數還很少，後來他們終於變得如此地強大，以致能取得政權。但是他們有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呢？

這一點本來應該由立憲會議來說明的；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樣，布爾什維克也要求召集立憲會議，甚至在一個時期還大聲疾呼地要求過；這是一個要根據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選舉權來投票選舉立憲會議。

在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之後，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就批准了新政權。當然是在一個強大的少數派的反對之下批准這個少數派退出了大會，表示抗議。但是多數派也還沒有拒絕。

立宪會議的主張。批准蘇維埃政府的決議案在开头是这样說的：“在召集立宪會議之前，为管理國家起見，应成立临时工农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員會’。”

这样看来，在这个決議里，立宪會議被承认为是比人民委員會更高一級的机构。

十一月三日，政府解散了彼得格勒市議會，其理由是市議會違背了人民的观点，这种人民观点是在十一月七日的革命中以及“立宪會議的选举中”显示出来的。重选工作被宣布要根据現行的普选制来举行。但是过了不久，人們就在立宪會議的选举中挑出了毛病。十二月七日，全俄蘇維埃执行委員會公布了一个決議，其中說：

“無論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組成的机构的选举办法采取何种規定，只有在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被承认和被行使时，上述机构才能被視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这项真正民主的原則，适用于各級代表机构，而且也适用于立宪會議。……在平等基础上召开的工兵农蘇維埃代表大会，对于各級市的、地方的和其他的代表机构——立宪會議也不例外，有权下令限期重行选举。有关选区若有半数以上选民提出要求时，蘇維埃必須下令限期重行选举。”

多数选民随时能罢免那种不再符合他們观点的代表，这种要求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則的。与此相反，蘇維埃怎么会有資格下令重行选举，这一点根据上述的观点是无法解釋的。但是当时对于立宪會議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立宪會議本身的建立以及立宪會議的选举法还都没有受到触犯。

但是，布尔什維克在选举中没有得到多数，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因此，《真理报》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由列宁所起草的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立宪會議的一系列提綱。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篇提綱。其中一篇宣称，选举是在布尔什維克胜利之后不久，在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分裂之前就举行了。所以，左派的和右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并没有明确

反映真正的群众情緒。

凡是有这种看法的人，就会根据上述十二月七日发布的決議出这样的結論：在那些有社会革命党人当选的选区内应限期重新行立宪會議議員的选举。否則的話，上述決議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定的呢？但是到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決議已經被人忘記了。在这之間，我們这里所提到的两篇列宁的文章中的另一篇这时又彈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曲調。文章先向我們說明，这些剛选出的立宪會議沒有用处的，因为它并不反映出全体人民群众的真正情緒，然后又宣称，任何根据普选制选出的，也就是說由群众选出的立宪會議本就都是沒有用处的：

“苏維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作为其最高机构的立宪會議相比），而且是唯一能促成最无苦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①

未免遺憾的是，他們直到在立宪會議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誰也沒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會議。

这时，同立宪會議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场冲突以苏維埃的胜利告終，苏維埃的专政則被宣布为俄国的永久的政府形式。

七 苏維埃共和国

苏維埃組織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当时从事群众活动，为此就需要有一种群众組織。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組織，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組織一样，都只有几百名成員，受影响的工人只有几千人。在沙皇专制統治之下，政治性的和工业性的群众組織都不能建立。革命发生时业已存在的唯一的一种工人

^① 參閱《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六卷第 355 頁。——譯者注

組織是由資本家自己所造成的，即各个单独的企业。这些企业这时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组织。于是，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所。每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们又联合成代表会议——苏维埃。当时推动这种如此富于重要意义的运动的，正是孟什维克。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所有的形式中最广泛的，因为它包括了一切工资劳动者。这种形式推动了强大的行动，并且在工人的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国第二次革命爆发时，苏维埃组织也随即重新出现。而这一次，与第一次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的情况相适应，苏维埃是建立在更高级的基础上的。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依然是地方性的机构，而且限于各该城市之内。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不仅数目多得多，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单个的苏维埃结合成联合组织，这些联合组织又集合成全国性的机构，它的机构就是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一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要反对财政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拥有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迄今所用的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灵了。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面临一些任务，这种方法就嫌不够了，这时只有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顺利解决。

由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群众性罢工的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也曾被正式提出。一九〇五年的党代表大会赞成过这种主张。后来，一九〇六年的党代表大会曾试图打消工会干部的神经过敏和胆怯畏惧的情绪。党代表大会就群众罢工问题作出决议说：

“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时，应立即同工会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且应采取为成功地贯彻行动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根据在群众罢工方面的各种經驗，我們現在知道，这个決議本錯誤的。第一是因为群众罢工愈是出人意料地以一种自发的性在一定的形势下爆发出来，它就愈能获得成功。如果由党的和工会机构經過事先協議而发布命令，那末就必須有周密的準備作，这就不能获得任何成果。

还有一点理由是，工会官僚机构現在愈来愈反对任何大规模自发性的行动。工会依然是絕對必要的。无产階級工会的會員愈多，其工会的財力愈雄厚，无产階級就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那种受长期訓練的管理机构——也即官僚机构，就不可能具备那有許多手段的分布广泛的常設組織。工会官僚机构正如工会本样是必不可缺的。就像議會制度和民主制度那样，工会官僚机构有其阴暗面，但是对于无产階級的解放說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那样的。如上述两种制度是不可缺少的那样的。

但是这并不就是說，應該承认工会官僚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这种机构的职权應該限于它的最基本的、而且不能由別人来替任务，也即限于管理工会基金，限于发展工会組織的工作，限于工人进行斗争时同工人进行磋商。但是它不适宜于领导那种愈来愈志着时代特征的大規模群众斗争。工会干部正如議會議員那样以凭借他們的經驗和知識而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实际领导权愈来愈属于企业代表机构——工人代表會議。在除了俄国以外的各国，譬如說在英国，这种机构(工厂委員和工厂代表)都曾經同肩并肩地在群众斗争中發揮过巨大作用。

这样看来，苏維埃組織是当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它在我們去迎接的这一場資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能不能向苏維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一九一七年一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維埃中同社会革命党左派一起佔了多数的布尔什維克，在立宪會議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斗争組織的苏維埃变成了国家組織。他們廢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份斗争中爭取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維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

他們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

当然，他們并不想完全放棄民主。列宁在他四月二十八日的演說里把苏維埃組織称之为“更高級的民主类型”，称之为同“資產階級歪曲”民主完全决裂。对无产階級和貧农來說，現在已經實現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人們一向把民主理解为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被法律賦予特权的諸阶层，总是享有行动自由的。但是这并不被称为民主。

苏維埃共和国据說該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組織，用列宁的話來說，是唯一“能够促成最无苦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組織。社会主义仿佛該从这里开始；就是使那些沒有代表參加苏維埃的一切居民阶层都成为在政治上沒有权利的。

在有关无产階級专政的主張方面需要讲的話，我們已經闡述过了。我們只需要就无产階級专政在苏維埃中的表現形式还作几点說明。

为什么同普选制所能做到的相比，无产階級专政能够更无痛苦地促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显然是因为用这种方式把資本家排除在立法工作之外。

这样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資本家和他們的追隨者只是无足輕重的少数。那末在普选制之下他們怎么能阻撓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相反，如果資本家在普选制之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那末他們就会比起在一种規定得任何人都不能有把握地說哪个党真正获得居民大多数支持的选举制之下，更能安分守己。实际上，单把資本家的权利予以剝夺是不可能的。在法律的意义上，什么是資本家呢？是有产者嗎？

甚至在德国这样經濟非常先进、无产階級人数极多的国家里，只要成立苏維埃共和国，就会有大量的人成为沒有政治权利的人。一九〇七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門的从业人員（从业者及其家屬）中，職員和僱佣工人的人数就略多于三千六百万

人，独立生产者的人数占一千七百万人。可见，一个政党也许能获得大多数雇佣工人的支持，但是在全体居民中还占少数。另一方面，在普选制之下，工人如果团结起来的话，也不需要害怕他们的敌人。而且工人在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必需的普选制，比起把政治斗争局限于苏维埃里来，更能使工人团结起来，因为在苏维埃里，阶级敌人已被排除出去，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完全采取了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里是在正式培养宗派狂热，而不是培养阶级觉悟。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种可能。资本家及其追随者不是少数，而是一大堆人，他们也许能够在一种在普选制的基础上选出的议会里成为一个厉害的反党派。不许这个反对派在立法机构里讲话，这样会使情况有什么改善呢？

资本家本身在无论何处都只构成一个薄薄的阶层。但是，同社会主义者对比起来，他们的追随者可能是人数众多的。不能有这种想法：即只有被收买的或者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们才赞成资本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资本主义今日是唯一可能较大规模地进行的生产品方式。谁若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末，如果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就必然赞成资本主义，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甚至在那些落后的、对资本抱敌对态度的阶层中间，有许多人还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从而就处在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居民中间直接或间接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的诸阶层的人数可能是很庞大的。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这样并不就能减小他们的反对。他们却会更强有力地对抗这个新的暴政政权的一切措施。在充分民主的普选制之下，一切阶级利益都按其力量大小而在立法议会里有其代表。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最自由的批评，指出这个法案的缺陷，而且还能表示在居民中间存在的反对力量的大小。在苏维埃里，一切反对的批评都被排除，法律的缺陷也不容易暴露出来。而关于居民中间将对它进行的反对，起先也完全无从知悉。直到后来，当法律已经颁

时，才出現批評和反对。法律的缺陷不是在討論中，而是在执行中暴露出来。因此，苏維埃政府甚至对重要的法律，也不得已而用补充規定和放寬实施，使之面目全非，使那些剛剛从前門庄严地抛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門回来。我們已經指出过：与普选制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选举制具有一种使参加者眼光狹小的傾向。这一切竟然会比普选制、竟然会比那种按实力对比关系参加議会的各政党之間的自由討論更能促成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很可怀疑的。

而在苏維埃宪法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同这种无痛苦性一样值得怀疑。专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这是否就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在俄国經濟结构的条件下，苏維埃只能用下列办法来取得其統治地位：即它們在一九一七年，不像在一九〇五年那样使自己仅仅局限于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次，士兵和农民也組織到苏維埃里去了。随着軍队的解散，士兵失去了他們在人数上的重要意义。人民委員們所招募的为数不多的軍队，其重要性对于人民委員們来讲与其說在他們的选票上，还不如說在他們的刺刀上。当然，紅軍的选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輕重的。在各地的苏維埃中，譬如說在彼得堡最近一次的改选中，士兵們保持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席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选票，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絕大多数。按照苏維埃宪法，在有权参与立法和参加政府的居民中間，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那个在我們面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执行下去，如果一般說来真有一个阶级能直接实现那种本来只有政党才可能实现的这种专政的話，那末它就会成为农民的专政。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掌握在农民手里时才有保证。但是，如果农民在苏維埃組織中构成了大多数，那末苏維埃組織在另一方面也就不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了。

哪些人可以組織在苏維埃里，哪些苏維埃可以参加总的組織，这些观念起先是不完全明确的。往往流行着这种看法：每一个职业組織都能組成一个苏維埃，而且被看成是一个苏維埃。《萊比錫人民

報》还在五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苏維埃共和国》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来自布尔什維克方面的。文章中說：

“苏維埃代表机构具有胜过任何民主代議机构的优越特
它給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有关国家的一切階級都
有在苏維埃里获得一种确切地符合其力量及其特定社会比
代表数目的充分可能性。为此，不言而喻，他們必須把自己
組織起来，当然不是按照迄今所实行的民主主义的公式組
党，而是按照新的民主形式，組成特殊的階級組織和工会組織。
列金^①之流可以对这种把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降低到工会組織
面的做法感到很滿意。而那些想要用等級选举制来代替普遍、
选举制的反动分子們，也会在这里发现一朵可以从中吸取花蜜的
花。这位无产階級专政拥护者接着又說：

“資产階級作为这样的階級，在苏維埃里迄今一直沒有
表，这并不是因为不讓他們参加，而是因为他們在他們那一
对苏維埃实行抵制，另一方面他們不願意按照无产階級的
把自己組織起来。”

資产階級真的不願意这样做嗎？我們的这位布尔什維克朋
道从来沒有听說过像企业家組織这样的組織嗎？在他看来，在
制之下，資本家个人在苏維埃組織里果真比企业家組織更危
然而我們馬上就会領教到：苏維埃組織胜过普选制的优越性
何在：

“不言而喻，可以这样推断：資产階級的任何战斗組織
会被允許参加苏維埃。”

換句話說，比起普选制来，苏維埃組織具有这种优越性，較
专橫。它可以把凡是被它认为是敌对組織的一切組織排除在外
“給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言而喻”，他們只能
苏維埃政府的旨意来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人們却

^① 1861—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修正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
者注

現，这样行不通。七月十二日閉幕的最近一次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拟訂了一部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規定，有权选举苏維埃代表者，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全体公民，而只是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只有“靠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取得生活資料的”人們才有选举权。但是什么是“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呢？这是一个确实富于彈性的概念。同样富于彈性的是关于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人的規定。这种人里面包括“以获利为目的而雇用工資劳动者的”人。有一名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手工艺者，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者完全一样，但是他沒有选举权。关于剝夺私营商人和居間商人的选举权的規定，可能会使还多得多的无产者变成沒有权利的。失业的工人为了勉强維生而开了一个蔬菜鋪或者去販卖报纸，他也就丧失了选举权。

另一条規定把下面这些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們“获得非劳动的收入，譬如資本利潤、企业收益、产业收益”。这里面沒有說明，使人丧失选举权的“非劳动的收入”的数額必須多大。有儲蓄銀行存折的人是否就屬於这一类？許多工人，特別在小城市里的，都有一所小房子。为了維持生活，他們还把房間租給房客。这种人是否因而就屬於获得非劳动收入者之列呢？最近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罢工，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九年还把把这个工厂称为“革命的堡垒”（《革命中的俄国》第83頁）。我問过一位布尔什維克同志，他如何解釋这次反对苏維埃政府的抗議行动。

他认为，“这很簡單，那里的工人都是資本家，他們人人都有一所小房子。”

由此可見，根据苏維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被冠以資本家的称号并且丧失选举权，是何等輕易的事情。

足以引起最大专橫的选举法在确定概念方面的彈性規定，不應該归咎于立法者，而應該归咎于其所确定的对象本身。在法律上对无产階級这个概念加以毫不含混和恰如其分的規定，这是永远也做

不到的。

我沒有找到关于成立一定机构来审查每人的选民资格并編制选民名册的規定，也沒有找到关于是否应进行秘密投票或者可以用举手方式进行公开表决的选举程序的規定。第七十条規定，“具体的选举程序……将由地方苏維埃依照全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之。”

列宁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关于苏維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說中，提到其他問題外，曾闡明以下两点：（1）只有劳动和被剝削的群众是选民；資产階級不在此列。（2）选举上的任何資产階級手續和限制均予以廢止。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由此看来，仿佛任何选民會議都可以随意規定选举程序。专横手段和排除无产階級內部那些不順眼的反对分子的可能性，也就峰造极了。

規定中只是順便地提到，对高級苏維埃的选举是間接选举，也有助于在选举中發揮那种不利于反对派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还是无法阻止反对派在苏維埃里获得发言权。

但是，向社会主义的“无痛苦的过渡”，显然要求迫使任何反对派和批評沉默下去。所以今年六月十四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決議說：

“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維克的代表应被排斥在外，同时并建議一切工人、兵士、农民和哥薩克代表苏維埃，將他們中間的上述派別的代表开除出去。”

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有一定刑事罪行的某些人的。凡被控对政权犯有罪行者，将立即徑予逮捕，毋須再予以开除。苏維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沒有提到苏維埃代表的优免权。在这里，从苏維埃內驅逐出去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但是这实际并不意味着，而只意味着凡是站在那些政党立場上的一切无产者都丧失选举权。他們的选票不被計数。这方面是沒有一定界限的。苏維埃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規定：“为了整个工人階級的利益起見，凡是損害社会主义革命而濫用其权利的个人或整个集团，均应由俄

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剥夺其权利。”

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剥夺公民权者。因为任何政府，即使是革命政府，都会发现反对派滥用其权利。但是这还不足以保证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把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中派和右派反对派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之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之间立即就爆发了大斗争，他们本来是同这个左派一起组成政府的。于是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的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

因此，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缩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可是，在这方面，任何政权，即使是专政的政权，都有这种需要：即显得是体现了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而且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是全体人民的大多数。即使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摆脱这种需要。

七月六日的巴黎《人民报》报道了龙格和苏维埃共和国驻伦敦大使李维诺夫的一次谈话。除了提到其他问题之外，龙格说：

“李维诺夫公民，您知道，甚至那些对于你们的运动极其同情的同志们也由于立宪会议的解散而感到痛心。当我上次在一月间见到您的时候，在我这一方面我已经对您谈过。难道您并不认为，为了对付别人对你们进行的攻击，你们无论如何都应该举行（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吗？”

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

“鉴于当前的形势，目前不可能这样做。苏维埃形式所表现的民主——群众意志的正确表现——是目前适合于俄国的唯一的代表制形式。另外，那些对上次苏维埃选举表示抗议的人——那次选举对他们说来是毁灭性的——也会反对选举新的立宪会

議，我們毫無疑問地會在这次選舉中獲得多數。”

如果李維諾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對此確有把握的話，那末他為什麼要反對選舉呢？

如果这次選舉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舉行而且布尔什維克獲得多數，那末現政府無論在國內或在國外所贏得的道義上的基礎，會比維埃政府在目前的選舉方法和執政方法上從來所能贏得的基礎還強固得多。首先是，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就會喪失任何反對理由，無產階級國際就會一致地全力支持蘇維埃政府。

如果對於獲得多數如此有把握，那末為什麼要放棄這種莫大好处呢？難道因為普選制目前對俄國不適合，而且只有蘇維埃組織才符合俄國的需要嗎？但是用什麼來證明這種論斷呢？如果能問一下，任何政府都喜欢使自己和國家等同起來，并且喜欢宣稱凡是這個政府不適合的東西也就對這個國家不適合，那末，上述的論斷自然就可以理解了。

當然，還有一點需要補充。今天的形勢是不利於舉行立憲選舉的。在準備和舉行第一屆立憲會議選舉的當時，俄國國內還在某種程度的平靜狀態下。今天，內戰已經把俄國弄得四分五裂。是，難道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九個月來的這種結果就構成了證據，證明蘇維埃組織是最適合於俄國的組織，并且是能實現最無痛苦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組織嗎？

八 实际事例的教育

對於這裡所論述的專政方法的坏处，現在還應該舉出它的來進行對比，即這種方法提供了一種十分出色的实际事例的教育。使這種方法不會保持下去，它也會具備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無法抹煞的許多好处。

我們首先来考察一下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这个論点显然是由于下列的考虑而产生的：在人民的大多数派实行統治的民主国家里，只有在能爭取到大多数人贊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們若走下列道路就能快得多地达到目的地：即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少数派取得了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这个少数派的成績就会立即产生令人信服的作用，并且使那些以前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迅速皈依社会主义。

这听起来是很娓娓动人的，而且从老魏特林的嘴里已經这样动人地讲过。它只有一个缺点：即这种說法恰恰是以应该获得证明的假定为前提的。反对专政方法的人们恰恰就在反駁这种看法：即社会主义生产可以在沒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来实现。但是，如果这种尝试失败，那末它当然也提供了一次实际事例的教育，然而这是反面的教育，即不是引人入胜的、而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教育。

那些被这种教育所支配而不靠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考察来形成自己思想的、沒有头脑的、单纯崇拜成功的人们，在这种試驗失败时不会去考察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的。他們不会在条件不利或不成熟中間去寻找原因，而会在社会主义本身中寻找原因，并且会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根本不中用。

由此可見，实际事例的教育有其危險的一面。

我們对这种教育应该抱怎样的看法呢？

我們可以通俗地用下面的話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内容：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这就是群众所期望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們所以贊成社会主义的理由。自由的重要性不亚于面包。即使是生活小康者，甚至富裕階級，也曾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并且为了他們的信念而往往在財物和鮮血方面付出最重大的牺牲。对自由、对自决的需要，正如对食物的需要那样，是出于人的本性的。

社会民主党迄今一向对人民群众进行这样的实际事例的教育，

即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屈不挠地维护一切被压迫者的自由的；这些压迫者中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还有妇女、受迫害的宗教和种族、犹太人、黑人、中国人等等。由于这种实例教育，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就远远超出工资劳动者的圈子之外。

而现在，一旦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这种实例的教育竟然就被与它背道而驰的实例教育所排挤掉了。它的第一批措施居然是废除普选制和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为，关键问题在于要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一点必须不断反复予以指出。为了粉碎那一万名上层分子的政治影响，并不需要把他们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并不是用他们个人的投票来发挥这种影响的。

至于一切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农、较富裕农民、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立即就由于这种实例的教育而干脆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即使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样，那些因为社会主义为人人谋自由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会因此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这种做法不可能把任何迄今为止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争取过来。它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数目增多。

但是当然，社会主义确实不仅许诺了自由，而且还许诺了幸福。这似乎该使那些被共产党专政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感到宽慰。

有了面包和娱乐就能忘记丧失自由之痛的人，不是最好的。但是，毫无疑问，物质福利可以把许多以前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由于共产党的剥夺权利的政策而同共产党疏远了的人们引向共产主义。不过这种福利必须真正来到，而且要迅速来到——不是作将来的希望，如果这种福利要发挥实际事例教育的效果的话。

该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种福利呢？专政的必要性是以这个为前提的：即居民的少数派已夺得国家政权。这是由无产者构成的少数派。而无产者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人数，在正常的时期，只能运用这种武器来发挥影响，而且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

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作为少数派，无产者只有靠諸种反常情况的巧合，也即靠那种使政权崩溃、使国家衰微貧困的灾难，才能取得国家政权。

只有靠資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規模发展，只有靠資本主义所創造的并且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里的巨額財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現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用荒唐的政策——譬如毫无結果的內战——来消耗这种財富的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沒有提供任何足以极迅速地扩大各阶层福利的有利的起点。

如果作为已破产的国家政权的继承者而出現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是一个专政的政权，那末情况就会更加恶劣，因为內战会成为它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下，在物质資料方面所殘剩下来的，将由于无政府状态而消耗殆尽。

归根到底，为人人謀福利，就意味着要不断发展生产。摧毁資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凡是在資本主义生产还不能立即轉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資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繼續存在，否則，生产过程将告中断，从而引起普遍的貧困，这种貧困是現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

只有在无产階級在合作社的、工会的和城市的自治方面、在参加国家立法和政府监督方面受过了訓練而且許多知識分子願意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在凡是資本主义在新条件下已經成为不可能的一切地方，立即无間断地替代資本主义。

在一个在經濟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于无产階級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不能指望无产階級会具有这种成熟性。

因此，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推断：凡是在无产階級只能靠那种与民主相反的专政来維持国家政权的一切地方，社会主义所遭遇到的困难就会如此巨大，以致于看来专政根本不可能迅速实现普遍福利，并且也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那些被专政剝夺政治权利的人民群眾同这个暴力政权相和解。

事实上，我們看到，苏維埃共和国在存在九个月之后，不但没有造成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說明发生普遍貧困的原因。

我們看到有一篇从布尔什維克方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階級在俄国无产階級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綱》。其中有一論述“情况的困难”。第二十八条就是这样說的：

“二十八、无产階級在极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执行着积极的組織工作。国内性质的困难是：国民經济的破坏和极度枯竭，这是由于战争而使国民經济解体；資本家階級在十月革命前的政策（有意識的瓦解政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出現之后建立无产階級专政的“秩序”）；十月革命后资产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普遍破坏；旧軍官們、將軍們和资产階級的不断的、反革命的武装非武装叛乱；缺乏技术力量和无产階級本身缺乏教育（着重原文本来有的——考茨基注）；缺乏組織經驗；小资产階級——这是极端无組織的階級——的諸广大阶层的存在等等。”

这一切都是很对的。但是这除了說明条件的不成熟之外，不能說明其他什么呢？这难道沒有确凿地证明，在目前俄国的这种条件下一种在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实际事例教育”是不可設想的？現有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所共知的实际事例教育：它使人們有必要就下面問題进行理論性的爭論：即本来應該被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还无法显示出来。难道这就会使那些迄今为止还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用实际成果来使之信服的人因而就回心轉意了嗎？

当然，任何新的政权都可能遭遇一些意料不到的困难。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困难归咎于这个政权并且未經仔細考察实际情况因此而灰心丧气，那就做得不对了。但是如果不顾这些困难而坚持下去，那末就必须首先对这个政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具有坚强的信念。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对这个政权产生怀疑。崇拜成功的人是不可靠的倒戈者。

这样，我們在这里又要回过来再談談民主，民主迫使我们力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先用最有力的宣傳来向群众进行宣傳和

工作。我們在这里必須再一次拒絕專政的方法，這種方法用暴力的實際事例教育來替代說服工作。

這並不就是說，在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實際事例的教育不能有任何作為。相反，在這方面，這種教育能夠而且定會發揮巨大的作用，但不是通過專政來進行這種教育。

世界上不同的國家處於經濟和政治發展上很不同的階段。一個國家一方面愈是資本主義化，另一方面又愈是民主，那末它就愈接近社會主義。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愈發達，那末它的生產力就愈高，它的財富就愈大，勞動就愈社會化，它的無產階級人數也就愈多。而且，一個國家愈民主，它的無產階級就組織得愈好，愈有訓練。民主有時也會阻礙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但是民主是促使無產階級達到它取得政權和實現社會革命所必需的成熟程度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任何國家里，無產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沖突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和民主方面愈是先進，那末無產階級在這樣的沖突中不但能暫時取得勝利而且還能保持勝利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一國的無產階級在這種條件下取得了國家政權，它就會在那裡發現已經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和思想力量來使經濟立即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去發展，並且立即增進普遍的福利。

這於是就對那些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落后的國家提供了真正的實際事例教育。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群眾於是就會一致要求採取同樣性質的措施，而較窮的階級的其他各階層以及許多知識分子也會要求國家走這種為人人謀福利的同樣道路。這樣，即使在那些今天還沒有條件使無產階級單單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奪取國家政權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先進國家的實際事例教育也會使社會主義事業成為無法抵擋的。

我們不需要把這個時刻估計得很遙遠。在許多工業國家里，看來已經充分具備了社會主義在物質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條件。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問題僅僅是一個權力問題，首先是無產階級進行堅決

的階級斗争的团结問題。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現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更高度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实际事例教育可以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一点已经被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里指出过:

“一个国家应该并且能够向别的国家学习。即使一个国家已经走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軌道,……这个社会仍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社会能够縮短并且減輕那种生育的陣痛。”^①

我們的布尔什維克朋友們,尽管許多次援引馬克思的話,但是几乎完全忘記了以上的这一句話,因为他們所宣揚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規模試驗而已。他們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誕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縮短并且減輕那种生育的陣痛”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繼續用比喻來說明的話,那末这种做法更使我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瘋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产期縮短并且引起早产。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馬克思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国家能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說来,还要考虑到另一种实际事例教育,即一种更高度发达的企业形式能向落后的企业形式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

誠然,資本主义竞争在無論何地都力求把落后的企业鏟除,这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如此痛苦的过程,以致于受到这种威胁的企业会千方百計进行抵抗。因此,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430頁。

时，还会有许多在技术上已经陈旧的企业存在着。尤其在农业方面，农业的大企业经营只会取得很小的进展，有些地方甚至倒退了。

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在大企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起初将不得限于使现存的大企业社会化。如果社会主义农业这时取得了良好收获（如果用一种自由地实行社会化的人的劳动来代替那种在农业中收获不够良好的工资劳动，这种良好收获本来是可以指望的），那末，社会主义农业大企业中的工人的景况就会比小农的景况更有利，然后人们才能有把握地预期，小农也会大批地自愿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去，如果社会对他们提供了为此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话。而在这以前，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仅仅替社会主义准备了不充分的条件。想要在理论上说服农民有产者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促使农民的农业实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只有实际事例的教育才能有所助益。但是这种教育是以农业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为前提的。大企业在全国发展得愈广泛，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快和愈彻底。

大卫^①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目标，并且还尽量使之更加显著突出；这个目标就是：消灭任何农业大企业并且把它们支解为分支企业；这个目标对于在农业中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对于一般地在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目前俄国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着艾德华·大卫的精神所进行的工作。在俄国，实际上指导着革命方向的不是列宁，而是大卫。

这就是俄国革命所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这种教育说明了俄国革命在实际上资产阶级性质。

^① 1863—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理论家，尤以农业问题方面的修正主义理论著称。——译者注

九 专政的遺留物

甲 农 业

专政据说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理想的实际事例，而且即使专政在还没有达到其目的之前就不能维持下去而陷于崩溃，它也会通过其事迹而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拥护专政的人期望：专政将遺留下许多不能再被消除的遗产，并且还鍾除许多不能再被建立的东西。

正如其他许多观点那样，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察；一直还在这个革命的影响之下的，有这样的：他們把一切不适宜于他们的东西一律都冠以“资产阶级的”称号，予以譴責，在他們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見而已。

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从这种观察中所能得出的結論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的結論不同。专政能比民主做到更激进的事，但是这些事的后果恰恰并不总是专政者们所想要的。虽然专政者何等高高地凌駕于国家其他一切权威之上，但是他們仍远要仰賴一个因素，即仰賴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基础，而专政者的意志，将决定专政的社会效果最終将会是什么。

法国革命中恐怖統治的最强大动力，是巴黎的无产者和半无产阶级小市民。他們想要的是：平均财产，摧毁大资产。他們在許多情况下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們对封建残余的摧毁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要彻底得多，他們从而就最有效地替新的资本主义大资产起鋪平了道路，这种大资产在恐怖統治推翻之后立即就像雨后天般兴起。平等主义者的那种专政的遗产就是大资产的兴起，本不是什么經濟平等。

要了解目前苏維埃专政的經濟遗产将会是什么，我們就不

須也考慮到它的意圖、願望和措施，而且還要考慮到俄國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是有決定意義的。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種考察也許顯得是單調的學究式的做法，這種做法同馬克思這樣的人在內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似乎是不相協調的。誰也不能有把握地說，馬克思如果在目前的形勢下會想些什麼和做些什麼。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單調的學究式的做法會證明是唯一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做法，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正是馬克思的最不朽的功績之一。如果有人認為在認識問題上單純的熱情比專業知識還更重要，這種人就會被馬克思當作空論家而撇在一邊。

直到現在，俄國的經濟基礎還是農業，而且是小農生產。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也許甚至是六分之五是靠小農生產維生的。一九一三年，俄國（不包括芬蘭）的城市人口是二千四百萬，農村人口是一億四千七百萬。農村人口中的壓倒多數是農民。革命並沒有使這種情況發生任何變化。毋寧說在過去幾年里這種情況更加發展了。許多工人回到農村去。城市中的飢荒情況比農民中間要嚴重得多。

革命以前，農民一直在半封建的壓力下生活。誠然，一八六一年的改革曾廢除了農奴制，並且使農民成為在形式上自由的人。但是這種改革不是革命的結果，而是家長式的專制統治的結果，這種統治以父愛的態度關心着要使大地主在改革中不會受到任何損失，反而要得到好處。農民為了獲得自由而不得不支付的代價是喪失他在改革前所耕種的一部分土地，農民還必須為那片指定給他的土地支付高昂的地價。俄國農戶的平均土地擁有額確實比西歐高。革命以前，在俄國，擁有土地五俄畝（五公頃）以下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10.6%，而在法國，擁有土地五公頃和五公頃以下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71.4%，在德國，占76.5%（見馬斯洛夫著《俄國土地問題》，斯圖加特1907年出版，第19頁）。但是，由於農民無知、技術原始和牲畜肥料缺乏，俄國的農業是如此地落后，以致於俄國農業的生產率比西歐農業低得多。在法國，每俄畝土地的小麥產量是70.5普特（一普特等於16.38公斤），在德國，其產量是77普特，而在俄國，則只有28.2普特

(馬斯洛夫所著同書第 20 頁)。

因此，農民在獲得解放以後在物質上處境比以前更惡劣了。農民貧困了，農民的企业沒有發展，毋寧說反而衰落了。為了避免飢餓，他們不得不從大地主那里佃入土地，或者在大地主自己以大企業方式經營的土地上去當雇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預借資，因而就陷于債務奴隸身分，這種身分往往比以前的農戶身分還受壓迫得多和更無指望得多。

這種狀況並沒有因為這時農民的产品能在市場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出售而有所改善。農民們从产品出售中得到錢幣，並且有可能把錢幣儲蓄起來。但是這只是在犧牲農民自己食用的情況之下才能做到的。在這以前，農民的絕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食用的，因為他們不能銷售農產品。這時他們能找到銷路，他們就尽可能多地銷售農產品，尽可能少地留下供自己食用。因此每逢收年，這一年就總成為飢餓年。農民這樣所儲蓄起來的錢，並不用来改善其農莊的耕作，而是用来添置土地。

在一八六三到一八九二年期間內，俄國歐洲部分的土地買賣情況如下(單位：百萬盧布)：

	買進	賣出
貴族	821	1459
商人	318	135
農民	335	93

由此可見，貴族的土地減少了，而農民的土地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土地都增加了。但是農村人口增加得更快，於是每個農民平均有的土地的面積減小了，儘管農民土地的總面積有所增加。同時受到國家立法鼓勵的貨幣經濟的作用下，那種從前往往發揮着使各個農民的土地占有額趨于平均化作用的村社共產主義也日漸消失了。個別農民富裕起來，其他的農民則更加貧困了。但是，這種農民——富裕農民和貧苦農民——都愈來愈貪圖大地主的土地，他們指望靠這種土地來挽救自己。他們渴望推翻農村中的財

系。他們于是变成了革命的階級。通过城市里的革命知識分子，农民的渴望得以表达出来并且具备了表现形式。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点上的看法曾經是一致的：即对俄国說来，土地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正如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革命那样，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社会主义者中間却形成了两个派別。其中一个派別认为，原始的村社共产主义使农民能够、从而使整个俄国能够立即跳跃到社会主义去，当然是跳跃到一种完全独特的社会主义去。这个派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后表现为社会革命党的形式。同他們对立的另一派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拥护这样的原則：即正如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即将来的革命只能鏟除封建主义的殘余并且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階級——他們受过新近赢得的民主的訓練——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然后俄国无产階級——在同西欧的无产階級处于同样水平的情况下——才能与西欧无产階級同时爭取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別都曾經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农民力求鏟除封建主义殘余的努力。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农民显然已經有了这样的觉悟。从那时起，农民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尤其是以社会革命党人为媒介，具备了愈来愈紧密的形式。因此，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苏維埃組織不仅作为无产階級的組織，而且也作为农民的組織而出現。

由于革命，大地产就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把大地产交給农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要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根本沒有一致的意見。可以設想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最合理的办法本来是把大农場收归国有，然后由那些迄今一直在这些大农場中当雇工的农民用合作社的形式来經營这些农場。但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前提是要有农业工人，而农业工人是俄国沒有的。另外一个办法本来可以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但是把它們分成小块，租給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許还会实现

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小农庄只要有可能总是力图取得对其生产资料的完全有权。一直到現在，它們無論在何地都还显示出这种特性，俄国的农民尽管有村社共产主义的傳統，也并不例外。打碎大农場并且加以分割，这就是农民的綱領，而且农民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綱領。誰也阻擋不了他們。

然而，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起見，妥善的做法也許是：有系統地分割大农場，把土地分給最需要土地而且能够加以利用的人。只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实行这种有系統的分配，这就是立宪會議，它是全民族的——包括农民大多数在內——整个意志的代表者。

但是这要等很久才能实现，农民在各地都已經开始自己行动起来，与此同时，許多很有价值的生产資料已被破坏了。于是，苏維埃組織放棄了由立宪會議来解决土地問題的一切希望，并且交給各地的农民这样的职权：着手按照农民的願望来处置大庄园的土地并根據农民的意願来分配这些土地。苏維埃政府最初頒布的第一號命令中，有一个法令規定：

“一、立即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連同其房屋和不动产以及庄园建筑物和附帶設置，在立宪會議就土地問題作出決議之前，一律交由区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維埃管理。”

关于立宪會議的字样，始終不过是紙上空文。实际上，各区农民可以着手随意处理土地。

这样，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那些有許多富农的富裕地区与有真正貧农的貧瘠地区之間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在各个地区，都没有关于誰分得土地的任何保证。凡是富农居統治地位——無論于他們人数众多或者由于他們势力雄厚——的地区內，他們就占有大庄园的大部分地产。关于土地分配情况的通盤統計是沒有的。是常常听人說，在分地时，富农通常分得最多最好的土地。

毫無疑問，甚至蘇維埃共和國，也並沒有根據平均分配土地的精神來解決土地問題。蘇維埃政府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蘇維埃共和國剛成立時，農民蘇維埃是全體農民的組織。現在這個共和國宣布，蘇維埃是無產者和貧農的組織。富裕農民失去了蘇維埃的選舉權。貧苦農民在這裡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土地改革的經常的、大量的產物。在許多村莊里，貧農也許只占少數，否則的話，就不需要用剝奪富農和中農的選舉權來保護貧農。但是無論如何，貧農在俄國農民中總還構成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蘇維埃共和國這樣分配土地，看來是要使自己放心。這方面是要謹慎從事的。如果蘇維埃共和國觸犯了農民的私有財產，對這個共和國說來是很危險的。

當然，蘇維埃共和國干涉了富農和貧農之間的關係，不過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為了消除城市居民的缺糧現象，把武裝的工人隊伍派到農村，奪取富農的余糧。這種糧食一部分發給市民，一部分發給貧農。這種做法也許只能被看成是一種臨時的應急措施，並且是僅僅限于某些地區——大城市的四周——的措施。如果要普遍實行這種措施，那末城市的武裝力量就完全不夠了。這種措施無論如何也無法實現農村的貧農和富農之間的平均化，即使年年定期地反復實行它。這種措施到最後也許會成為徹底摧毀農業的有效手段。

如果生產還是私人方式的而且生產者必須預計到除了滿足他自己需要所必需的以外的他的全部剩餘產品都會被人拿走的話，那末他就會使他的生產僅僅局限于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這就是某些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的農業衰落的原因之一，這些國家的徵收賦稅的地方官把農民的除了最必需產品以外的任何剩餘產品統統拿走。俄國也許會出現類似的情況。社會主義是要用生產資料和生產方式的社會化來消除經濟差別。社會從而也成為產品的主人。同時，社會將使生產增長到最高度，並且根據社會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觀點來分配產品。

相反，允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私人生產的繼續存在並且經常沒

收生产者所获得的剩余产品,这样就无异是使生产陷于崩溃,不管怎样做是服务于东方专制暴君还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当然并不适用于那种仅仅把它视为临时应急措施的情况。在这类情况下,这种做法有时是必不可缺的。目前剥夺富裕农民的做法也许仅仅被视为一种应急措施。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办法只会给生产过程带来不安和內战的新因素,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就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

但是,即使苏维埃的专政拥有重新划分土地并且完全平均分配土地的力量和意志,这样做也不会对农民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目前的原始生产的情况下,俄国还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使每个农民分足以使他們摆脱贫穷的土地。

馬斯洛夫在那本多次被援引的书里說得对:

“要使农民土地平均化的企图,只有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想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使人人富有,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空想。如果这种平等无法实现,那末,与此相反,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贫穷的平等,而且这种情况的蔓延也许几乎不能鼓舞任何人。无论能把农民的土地拥有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土地永远总嫌太少,以致于无法使所有的农户都富裕起来。

想要把农民生活强行纳入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全体小所有者在经济上平等——的框框内,这不仅是空想,而且是荒唐的。”(第 240 页)

在目前人口数字和现有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种土地分配办法可以在经济上普遍提高俄国全体农民的水平。为此,就需要过渡到更高级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要求改进农村居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并且使农民拥有更多的牲畜、农具、机器和化学肥料——这一切都是在普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起来最困难、也最缓慢的条件。

如果说精耕细作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在俄国只有很薄弱的

展而且还在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而暂时更为恶化，那末，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在俄国就还根本不存在；后者的条件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只有这种技术，运用科学，运用最完善的机器和操作法以及細密的分工，才能使大企业在經營上有利，而且，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經營有利——即提供更多的产品或者节省劳力——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納和巩固下来。想要在俄國小农的原始技术和无知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大企业，这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布尔什維克方面确实有人常常談論：在摧毁大农場并将其土地分給农民之后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我們曾經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階級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綱。提綱第二十四条写道：

“然后必須提出完全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土地和耕地被宣布为‘公共财产’。其他任务如下：組織国有的农业，集体耕种从前的大庄园，把小农户联合成一种拥有集体管理机构的較大的单位（即所謂“农业公社”）等等。”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一項任务，并不能从而就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注定是一紙空文。無論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論說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农民合作社里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經濟部門，只是沒有包含这个基本部門：耕种土地。以小农技术为基础的耕作，無論在何地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力图使单独的小企业彼此分开并且力图取得对土地和耕地的私有权的傾向。在欧洲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美洲也如此，在全世界正在重演这种情况。难道俄国农民恰恰就是这样的非凡的与众不同的人，以致可以摆脱这个普遍規律嗎？凡是把俄国农民看成普通的人而且把他們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拟的人都会认为，那种指望在目前俄国农业基础上能建立社会主义經濟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革命目前在俄国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說是与一七八九年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国革命的余波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

革命鏟除了封建主义的殘余，从而使土地私有制比以前更純粹和強烈地表現出來。革命使那些迄今一直對推翻土地所有制——這說大土地所有制——感興趣的農民現在成為這種新建立的土地所制的最強有力的維護者，革命還使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商品生產鞏固起來，而這兩者構成了一種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資本主義產得以自然而然地不斷重新產生，即使這種生產也會一時受到擾亂甚至遭到破壞。

甚至較貧苦的農民，也並不想放棄土地私有制的原則。他們想用集體企業的辦法，而想用增加自己土地擁有額——因而也就增加私有財產的辦法，來改善自己的景況。對土地的貪求，永遠標着農民的特點，這種貪求在大農場瓦解以後現在已經成為私有制最強有力的支柱。在一切已經打倒了封建主義的國家里，農民就現為私有制的最強有力的支柱。農民作為這樣的支柱，就被有產級當作他們的最可靠的警衛隊來加以培養和照料的。俄國的情況不會有其他的發展趨勢。

這將是目前俄國“無產階級和最貧苦農民的專政”的最無疑義和存在最久的結果。

因此，一旦農民的新私有制得到了保證，他們對革命的興趣就即消失。農民們會起來反對任何想要犧牲他們的利益而恢復舊的地主所有制的勢力。但是農民並沒有興趣去超過這個限度。

而且，正如農民對革命的興趣那樣，農民對他們迄今的同志——對城市無產階級——的興趣也會隨之消失。

農民為自己需要而生產的比重愈減小，為市場而生產的比重愈大，愈是依賴現金收入，那末，農民對自己產品售價高昂的興趣也愈大。在封建主義被打倒後，這就成為了支配着農民的一種興趣。這種興趣使農民同大地主所有制相對立（毋寧說大地主在這種對立上是同農民一致的，而且是農民的同盟者），却使農民同非農業的、城市的、工業的居民對立起來。首先是同工人相對立，因為購買食物費用在工人收入中所占份額比它在資產階級收入中所占份額大，

以工人对食品价格低廉最感兴趣。

只要封建主义还存在着，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最好的同盟者。他们在从一五二五年德国农民战争起一直到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为止的历次斗争中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农民随即就转向同城市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不仅富农同大地主一样也处在这个阵营里，而且小农也如此，甚至在像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这样。

农民转向这个阵营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随着反封建斗争传统的日益退化以及为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日益被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排挤的程度而逐渐完成的。所以，我们的队伍里还长期保持着马克思还在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里所主张过的观点，仿佛农民还会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阶级并肩前进那样，参加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目前还在寻求一种土地纲领，也就是说在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生兴趣的纲领。但是实践却在无论何地都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

在农村里，同城市无产阶级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只有那些自己就是无产者的分子，也就是说，那些不靠出卖农产品，而靠出卖其劳动力维生的、即靠工资劳动维生的人。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工资劳动在农村的扩大，这个过程如果靠农业大企业的增加就只能很缓慢地、甚至往往根本不能完成，但是如果靠工业企业的迁移到郊区，就能迅速完成。此外，无产阶级的胜利还取决于这一点：即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比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增长得快。而这是一个进展迅速的过程。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里，农村人口不仅在相对地减少，而且甚至在绝对地减少。在德意志帝国，一八七一年全国人口四千一百万中，农村人口还占二千六百二十万，即占人口总数的64%，一九一〇年，全国人口六千五百万中，农村人口就还只占二千五百八十万，即人口总数的40%。农业人口比农村人口还要少。在一八八二年第一次职业调查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

日四千五百二十万中还占一千九百二十万，即占人口总数的 42.5%。一九〇七年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六千一百七十万中就还只占一千七百七十万，即占人口总数的 28.7%。在这一千七百七十万人中，耕农只占一千一百六十万，雇工占五百六十万，其余是雇佣人员。由此可见，农民人口在德意志帝国的人口总数中只占六分之一。相反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在一九〇七年就占三千四百万，也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的人数无疑还在迅速增加，距离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数字不会再遥远了。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在俄国所占的优势是何等巨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共同斗争，这使革命得以取得胜利，但是却也证明了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次革命是作为这种性质的革命而完成和巩固，也就是新赢得的农民私有财产愈稳固，那末就愈加奠定了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另一方面又引起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增长的基础。在今日俄国所在的阶段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经济趋势是极其强烈的，甚至最有力的专政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毋宁说，这个专政，作为农民的政策，倒还会促进这种趋势。

乙 工 业

俄国的工业是同农业不一样的。虽然这种工业也还表现出许多原始的形式，但是俄国工业的资本主义部分正是由于它是最近才兴起的而表现出最现代化和最高度发展的形式。俄国的产业工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来自农村，完全受着乡村观念的狭隘性束缚。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人掌握了无产者今天所能获得的充分现代化教育；他们对理论很感兴趣，就像半世纪前被马克思赞扬过的英国工人那样；俄国工人有强烈的求知欲，而在西欧工人中间，求知欲却往往被民主的琐碎工作所磨灭了。

在这个基础上难道就已经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了吗？

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这些厂矿据为己有，以

每个厂矿单独进行生产，那末，人們也許可以认为能够建立。

正是今天，八月五日，当我写这段话时，从莫斯科传来了列宁八月二日的一篇演说；据说列宁在演说里说：

“工人会牢牢地掌握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还地主。”

“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而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工厂和土地属于社会。

个体农民在必要时可以在一种不与任何别的企业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田庄。相反地，一个现代化工厂则处在社会关系之网中，孤立进行生产是无法想像的。由各该工厂的工人来占有工厂是不够的，即使工人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纪律性来正确地管理工厂。如果没有来自其他企业的供应，没有原料，没有煤炭，没有各种辅助性材料，不能经常销售其产品，那末这个工厂一天也不能经营下去。如果原料生产者、矿山或是运输事业不起作用，那末这个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要对这个工厂实行社会主义经营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网。只有当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时，社会主义生产才有可能。

社会民主党不要求把工厂交给本厂工人，而力求实行社会性的生产，力求用一种为满足社会本身需求的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而这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才能做到。甚至布尔什维克迄今也只是宣布使工厂国有化，而并没有宣布把工厂交给工人。后者将只能意味着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像许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新的所有者将把他们的财产当作一种特权地位来加以维护，用以对付前来寻找工作的移民；而俄国农民，由于土地不足，尤其一定会源源产生这种移民。

永久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采取把工厂交给在本厂劳动的工人这种办法来实现的，而只能采取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说，归全体消费者所有，以便为他们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生产资料将归国家所有，那些单纯地方性的生产资料则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也

可能視具体情况而归消費合作社所有。

人們确实也曾試圖目前在俄国走这条路。在这方面他們會到什么程度，尚須等等再看。無論如何，苏維埃共和国的这一面是最感兴趣的；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方面的情况还完全处于朦朧状态。当然法令并不缺少，但是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如何，却無可靠的消息。沒有广泛的、詳尽的、可靠的和迅速灵通的統計；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苏維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作出这种統計。我們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經濟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核對。

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結果之一。由于沒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由于沒有一种有各階級和各党派代表参加并能在其中发表意見的中央代議机构，于是那些实际上的专政者們就很容易只把他們喜欢的消息向公众发表。不論他們是否利用这种可能性，人們對他們的报道总是不信任的。在这同时，批評並沒有沉默，批評只不过是寻求地下的途徑而已。批評通过口口相傳而扩散开来，其速度几乎就同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一样迅速，但是却不受公众的監督。謠言不受任何限制的。我們就是这样地听到无数来自左边和右边的消息，它們彼此矛盾，因此我們不得不对它們一律先表示怀疑。

因此，苏維埃政府的社会主义試驗将会造成什么結果，目前无法肯定，甚至无法对之作近似的估計。但是，如果苏維埃政府不能住自身，它难道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些不会再被取消而且能长期留下来的东西嗎？

也許不再有人会认为，苏維埃政府会根本消灭資本主义。它无疑可以消灭許多資本主义財產，把許多資本家变成无产者，但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那資本主义就会复活，而且必然会复活，而且大概会迅速重新复活起来，而无产階級专政只不过引起了一次人事更动而已。取代了过去資本家(他們如今成了无产者)的，是无产者和知識分子，他們会消灭資本家。与此同时，那些能及时地投效一个能在混乱中最終地

下来并把混乱导向正常状态的政府的人，就能得到最大的好处。現在苏維埃政府就已經感到不得不向資本作出各式各样的让步。早在四月二十八日列宁就已經在他那篇已援引过的演說（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新聞稿里）中承认，剝夺資本的工作进行得太快了。

“如果我們的剝夺工作还以同样的速度再繼續进行下去，那末我們肯定会遭到失敗。在无产階級監督下进行的生产組織工作显然已經落后于剝夺大資本的工作。”

但是这种組織工作正是关键所在。对于一个专政者來說，再也没有比剝夺財產更輕而易举的事了。但是要建立一套龐大的社会劳动机构并使它发挥作用，单靠一紙命令和赤卫队是不够的。

但是苏維埃政府在德国資本面前甚至比在俄国資本面前还更加畏縮，并且承认了德国資本的要求。协約国資本再度流入俄国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問題。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无产階級专政”似乎只是为了要替德国資本和美国資本騰出地方才消灭俄国資本的。

不管怎样，仍然可以預期：即使苏維埃政府被推翻，它所实行的某些工业部門国有化仍將繼續保持下去；除了摧毀大庄园之外，国有化可以被看成是无产階級专政所采取的并且不再能被撤銷而恢复原状的第二个重大步驟。这尤其可能，因为我們看到这是一种正在所有現代化国家（包括資本主义国家）里实行着的运动。战争的需要促成了这种运动（我們可以回想起美国的铁路国有化），而和平的需要將使它繼續下去。無論在何处，我們都必須对財政壟断有所准备。

但是这已經表明，国家經濟还不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要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而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今天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农民国家，因为农民已經学会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农民在俄国正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大可能在国家里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他們不适合于这样做。但是农民不再能容忍任何政权忽

視其利益——甚至对城市无产者的态度也如此。

面对着农民的商品生产，国营工业也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而不为国家的本身需要而生产。国营工业最主要的销路，即它的国内市场，恰恰是由农民组成的。

农民对廉价买进工业品正像对高价出售农产品一样地感到兴趣。私营工业怎么才能做到会有低廉的价格，是靠压低工资还是减少利润，这对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农民对私营工业资本的高利润不感兴趣。

然而就国营经济而言，情况却并不如此。国营经济的利润高，则国家岁入中税收所占份额就愈小；而税收在一个农民国家势必主要取自农民。由于这一点，农民对国营企业增加利润正像他们对国营企业产品价格低廉一样感兴趣，但是这却意味着降低工资。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一个矛盾的根源。国营经济发展得愈大，这个矛盾就愈显得尖锐。

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是这种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

把这种情况全都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当然是错误的。在那些人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中间，有许多事情是它所处的形势引的必然后果，如果别的政权当政，也肯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专使现有的种种矛盾尖锐化并使之达到极度；这却是专政的本质范围内的事情了。

饥荒不是专政造成的，而是由于沙皇统治的倒行逆施和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但是农业和运输事业在媾和以后的半年内恢复得如此之慢这却是内战的结果；而内战是在专政之下唯一的反对形式，因当群众对政治具有强烈兴趣时，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军队的解散也是布尔什维主义早已面临的一个过程。然而布尔什维主义自己曾夸口说，它最剧烈地促进了军队的解散从而迫使媾和实现；而目前甚至连它自己都不再为这次媾和感到高兴。

农民中间的粉碎大庄园制度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布尔什维克

政权之前就开始了的；由于农民占压倒多数，本来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件事。然而取消立宪会议却促成了这种情况：对于被没收的大庄园的利用问题所能施加的社会影响，连最后一丝痕迹都没有了，这些大庄园的分配问题完全听任那些具有最切身利益的人用纯粹私人的专横手段来加以处理。

最后，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一定会产生的。这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专政的统治却使那种使矛盾变得尖锐化和深刻化的条件趋于成熟。随着立宪会议的解散和军队的解散，最能保护俄国免于瓦解和分裂的两个因素就此消失。恰恰是那些旧俄最富饶的农业地区，现在脱离了它。如果这种发展再继续下去，特别是如果西伯利亚也脱离俄国，那末俄国就不再是谷物出口国或各类食物的出口国。那时，俄国农产品价格将完全由国内市场来决定，而不由国外市场来决定。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将最能表现出来而且最无法调和。在那些输出大量农产品的国家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国与国之间矛盾的形式，而不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也即采取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矛盾的形式。现在，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俄国本身已不再是农产品出口国，并且形成了一种势必会最迅速和最剧烈地引起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经济斗争的局面。

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完全避免。对于高瞻远瞩的政策来说，矛盾赖以发生的条件若能具有一种可以使无产阶级最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形式，这就越发重要了。创造这种条件——不仅为了对付资本而且也为了对付农业起见——就是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代表们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除了意味着最牢固地奠定民主基础之外不能意味着别的。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现社会性生产，但是这项任务，同实行社会性生产不同，在一个农业国里是可以

解决的。

像一切劳动阶级一样，农民也要求有民主。农民在一个民主和国里可以生活得很舒畅，正如瑞士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的政治兴趣不大会远远超出自己的乡村范围外；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整个国家机器，这不可能是地方性的行动。农民可能对这样一位皇帝很热情，他是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保护农民的财产，维护农民的利益，就像农民曾经想像拿破仑会做的那样。俄国农民将反对沙皇政权的复辟行动，对农民来说沙皇的复辟是同那些被农民恨之入骨的旧地主的卷土重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一个专政者能保障农民的财产，并且允许农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耕种其田地和善价出售其产品，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专政者也可能像共和国一样地受农民欢迎。取消民主宣布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于是就替那样的专政者廓清了道路。一个阶级的专政实际上是一党的专政，并且就像列宁自己所宣说的那样，也可能是个别人的专政。列宁在四月二十八日的演说说道：

“我们愈是接近于资产阶级的完全被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对我们来说就愈危险。只有用暴力才能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末我们就必须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承认那种强制地进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强制的形式将取决于有关的革命阶级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一些特殊情况，如反动战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形式。因此在苏维埃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和由个别人行使专政权力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

长远地看，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使农民怀有这种思想：专政——剥夺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似乎是最符合诸劳动阶级利益的政体。如果城市工人一旦同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以及同一种被

所承认的专政发生冲突，那末城市工人将会有什麼結果呢？

而如果工人自己的专政崩潰了，那末他們又会有什麼下場呢？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另一个可資选择的办法，只能是这个党的毀灭。专政使执政的政党势必力图用一切手段（包括正当的和骯髒的手段）来保持統治，因为这个政党的倒台就意味着这个政党的彻底毀灭。

民主就完全不同。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統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屬於哪个階級和政党。無論何处的无产阶级，都对民主最感兴趣。在无产阶级构成大多数的地方，民主成为无产阶级的統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地方，民主又成为无产阶级为保持自己、赢得让步和发展自己而进行斗争的最好的依据。如果居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通过一种短暫状态，即与另外一个階級結成联盟而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又打算用取消民主、取消少数派权利和取消反对派来使这种短暫状态永久化，那末这将是目光最短淺的实用政策，即只顧眼前的政策。无产阶级自己是在摧毁那唯一能使它在那种短暫状态以后賴以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展开工作和展开斗争的基础。

俄国无产阶级从苏維埃共和国里得到的真正的实际果实（不是法令），究竟是否比它从立宪會議——也同苏維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更多些，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如果苏維埃共和国崩潰，那末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成果也有随之而崩潰的危險。

假如立宪會議能够使民主获得巩固，那末工业无产阶级在立宪會議中以及通过立宪會議而获得的一切成果从而也将得到巩固。即使在今天，我們也把希望俄国无产阶级全部革命果实不致都被騙走的这种期望完全寄托于此：即专政无法扼杀俄国人民的民主意識，民主意識在經過內战的种种錯誤和混乱之后終將取得胜利。

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

十 新 理 論

我們已經看出，無論從一般理論觀點或從俄國情況的特殊觀點出發，專政的方法總不會給無產階級帶來好結果；儘管如此，仍然恰要通過俄國情況才能理解專政的方法。

反沙皇統治的鬥爭，很久以來就一直反對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的鬥爭；這種制度在目前條件下已經不再有任何基礎，它只憑借裸裸的暴力來維持，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予以推翻。這種情況甚至在革命者中間都也可能很容易導致對暴力的崇拜，導致過高估計純暴力所能取得的成果，這種單純的暴力並不以經濟條件為依據，由於某種特殊條件而超脫於經濟之上。而且，反對沙皇統治的鬥爭必須秘密進行，而秘密政治活動足以助長專政的非民主的風氣和習慣。

這些因素的影響當然是同反專制鬥爭的另一種影響彼此背道而馳的。我們已經指出過，民主包含着許多為眼前目的而進行的小鬥爭，而反專制鬥爭則與民主完全不同，足以喚起人們對重大事態和偉大目標的關心，喚起對理論的興趣。然而今天卻只有一種唯一的新的社會理論，這就是卡爾·馬克思的理論。

這種理論成了俄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這種理論教導我們：我們的願望和能力都受物質條件的支配；這種理論指出，哪怕是再強的意志，如果妄想超脫於這些條件之上，也是無能為力的。這種對單純暴力的崇拜是根本針鋒相對的，它同時還促使社會民主黨人一致認識到，他們在行將到來的革命中的行動有一定的限度；由於俄國經濟的落後，這次革命最初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

俄國又發生了第二次革命，它突然給社會主義者帶來了連他們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極大權力；因為這次革命導致了軍隊的全部

散——軍隊是所有制和資產階級制度最強固的支柱。隨着暴力手段的瓦解，資產階級制度的精神支柱也同時瓦解；無論是教會還是知識分子，都無法維持其威望。統治權落到國內最下層階級——工人和農民——手里，然而農民卻不是一個本身能夠進行統治的階級。他們樂意接受這樣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這個政黨答應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地立即恢復和平和立即滿足他們對土地的渴望。無產階級大眾也團結在這個政黨的周圍，因為它在向他們許諾和平的同時還許諾了麵包。

布爾什維克黨於是獲得了奪取政權的力量。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到來所必需的先決條件——無產階級的奪得政權——豈不終於具備了嗎？當然，經濟理論已經駁斥了這一點；即在俄國的社會條件下能夠立即實現社會主義生產；同樣也駁斥了上述這一點的是證實了以上理論觀點的下列事實：新政權決不意味着無產階級的單獨統治，而意味着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子的聯合統治，這種統治由於每方都讓對方在其領域內自由行動而得以維持下來。無產者不在農村里妨礙農民，農民不在工廠里妨礙無產者。

然而，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在一個大國里畢竟成了執政黨——這在世界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於戰鬥的無產階級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光輝的事件。

但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除了把它的權力用來實現社會主義之外，還能用來做什麼呢？它必須立即致力於此，並且不顧一切，毫無顧慮地掃清它所面臨的一切障礙。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民主同新政權發生了衝突，而這個政權儘管它迅即深得人心，但在國內並沒有掌握多數票；那末，這對民主就越發不利了。於是就不得不用專政來代替民主；這尤其容易做到，因為人民的自由在俄國還是完全新的東西，還沒有在人民群眾中扎下深根。這時，專政的任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這種實際事例的教育不僅應該使國內那些仍然持反對態度的分子順應潮流，而且應該吸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來效法它，鼓勵他們去革命。

对于每个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勇气非凡和令人向往着迷的想法。我们为之斗争了半个世纪的理想——我们常常以为它即将来临，但它却又一再迟迟不来——终于将要实现了。无怪乎全世界各国无产者都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欢呼。无产阶级统治的事实要比理论探讨更重要。这种普遍的胜利感，更由于彼此不了解邻国情况而越发加强了。只有少数人能研究外国情况；大多数人则都假定外国情况基本上同我们的情况相同——而在人们不作这种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对外国有种种十分离奇的想法。

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轻易的看法：认为无论何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者也因此而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西欧各国人民都临近着政治革命，正如以前的俄国人民那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俄国也同西欧一样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诸因素。

在军队已经完全被解散和立宪会议被驱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业已实行的方针所获得的后果而已。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可理解的，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相反地比较不大能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停留于只从俄国的独特情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做法并且用特殊条件的压迫来说明这种做法正确；按照他们的看法，由于这种特殊条件的压迫，他们除了专政或是让位之外未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后来宁可采取这种办法；即为了替他们的做法找根据而创造出整套理论，并且主张这种理论应该普遍适用。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特点之一——他们对理论具有巨大兴趣——来解释的，我们应该对这个特点很表同情。

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的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在这里，人們正好記起了馬克思一八七五年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階級专政这个詞。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現在这个詞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維埃統治而出現的那种政体。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說过在某种情况下能出現无产階級专政；他把无产階級专政这种状态称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不可避免的状态。当然，他几乎同时說明，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然而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在专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他也就从而自己表明，他所說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专政的拥护者却并不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馬克思有一次說过无产階級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們就声称，苏維埃宪法、剝夺苏維埃敌人的权利是已經被馬克思本人承认为一种与无产階級的性質相适应并且与无产階級統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政体。作为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存在就必须与无产階級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要一直存在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并且一切階級差別也都随之而消灭为止。这样，专政似乎就不是在局势一平靜时就應該重新让位給民主的一种暫时的权宜措施，而是我們必須对其較长期的存在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解釋，“社会主义革命提綱”第九、十兩項中說：

“九、迄今为止，人們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但沒有去研究这种专政應該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維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階級和(俄国的)农民的貧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即这里所說的并不是一种按专政这个詞的狭义来理解的暫时現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組織一种嶄新的国家形式，不應該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階級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須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

十、因此，无产階級专政的含义可以說就是对资产階級的經

常的战争状态。十分明显，所有那些叫嚷共产党人采取‘暴力行动’的人都完全忘记了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本身就是个‘粗鲁的暴力’行动。在各种文字中，专政这个词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暴力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暴力的阶级内容。这就阐明了革命的暴力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必须愈严厉。”

由此也就表明，专政的政体不仅应该是长期的，而且应该在一国家都出现。如果在俄国，刚刚赢得的普遍自由现在又被取消了，末，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会在下列这些国家里发生，他们的人民的自由已经根深蒂固，自由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更长的时期，人民经过反复的流血革命之后才赢得自由和保持住自由。新理论十分认真地作了上述的断言。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新理论不仅在俄国工人当中获得了支持；旧沙皇制度的压迫在这些工人脑海里记忆犹新，而现在他们因为翻了身而高兴，就像学徒一旦满师而感到高兴那样，因为今后他可以像师父当年殴打他们那样地殴打那些后学徒。不，甚至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家里也有人支持这种新理论。然而，还有更加奇怪和更加难于理解的事。

目前，无论何处都还找不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我们无论在里都还必须力求改革和改进。甚至在瑞士，也正在为扩大人民立权和比例代表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法的权力和遴选方式都迫切需要加以限制。而在那些官僚主义和军主义的大国中，我们必须提出更广泛得多的民主要求，以便增进民主，还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要求。正在这种斗争过程中，最激进的斗士站起来向敌人喊道：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将是把我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替自己所要求的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丝毫不加掩饰地讲到了这一点：

“十七、从前关于民主共和国以及关于普遍自由（就是說也給資產階級以自由）的要求在业已过去的那个阶段里，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阶段里，是正确的。工人需要有出版其报刊的自由，而資產階級报刊对工人是有害的；尽管如此，工人还是不能在这个阶段里提出消灭資產階級报刊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要求普遍自由，甚至包括举行反动集会和組織反动劳工組織的自由。

十八、現在則已进入直接打击資本、直接推翻和摧毀帝国主义强盜国家、直接压制資產階級的阶段。因此，絕對清楚的是：在現阶段里，在原則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說也給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

十九、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領導組織。这些領導組織——作为最活跃的反革命因素——的面目已被揭穿：它們甚至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府。在旧軍官支持下和被推翻了的財政資本的錢袋支持下，它們正在以各色各样阴谋最卖力的組織者的姿态出現。它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因此也必須用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它們。

二十、至于工人階級和貧农，他們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他們果真享有充分的自由嗎？

“社会叛徒”毕竟也是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們当反对派，因此他們也就像資產階級反对派一样地被剝夺了一切权利。但是，在資產階級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反对派的地方，我們豈不一定要对之表示极度憤慨并且竭尽全力来对它进行斗争么？

当然，我們必須这样做；然而如果那个資產階級政府能指出像上述言論那样的社会主义言論及其相应的实践，那我們就会啼笑皆非。

我們常常指責自由党人在执政时同在野时完全不同；指責他們在执政时把他們从前的民主要求全部拋棄。然而，自由党人至少还有这样的聪明，以致于不会在形式上拋棄民主要求。他們是根据下列原則行事的：只做不說。

无可否认，提綱的拟定者是比较誠实的，至于他們是否比較聰

明，那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德国社会主义党人公开宣布，他们今天所争取的民主，在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后就予以抛弃，那末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将会作何估价呢！人们会认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民主原则倒过来变成相反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原则；或者认为，对他们说来，民主不过是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一个梯子而已，一旦他们攀登到政权的高处，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梯子而把它一脚踢开；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即使对俄国革命者来说，下述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眼睛的政策；如果俄国革命者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专政的方法，不是为了拯救已受到威胁的民主，而是为了反对民主以保全自己。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地，如果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更确切些说目前还只是弱小反对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这种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这些人不但不把专政和剥夺广大群众权利的方法看成我们应该一般地予以谴责的东西，或者看成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俄国那种非常例外情况下的产物，反而竟然把这种方法赞扬为一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力求实现的状态。

这种论调不仅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它是危害极大的，如果这种论调被普遍接受，就会使我们党的宣传力量陷于极度的瘫痪。因此除了一小撮宗派主义狂热分子之外，整个德国无产阶级，正如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拥护普遍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将愤怒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以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而形成一个新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而开始。无产阶级将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关于全体人民享有普遍权利的要求含有一些思想上的保留，实际上只是为了替自己争取特权。无产阶级同样会驳斥这种可笑的过分要求：即无产阶级自己在今天就庄严宣称，民主的要求不过是谎言而已。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像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像反对无政

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专政并没有证明是一个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赖以确保其政权的一种手段；专政只能证明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许多它所力不胜任的任务，使它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弄得筋疲力尽和狼狽不堪。这时，专政很容易会损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幸而专政失败和革命崩溃这两者还未必就含义相同。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序幕，那末，上述两者的含义就相同了。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末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